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題目：熊式輝與江西省政(1931~1941)



指導教授：楊維真 博士

學生：李政儒

學號：699120016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 謝 辭

經過了漫長的路途，終於完成這本碩士論文，總算是對自身的付出以及堅持有了交代。而接下來又是另一階段的開始，希望自己也能吸收記取這一階段的成果及經驗。

而此本論文受到課業與時間的壓力影響，許多內容（如研究資料的使用、書寫的成果）仍不夠完善，未來若有機會，希望將本論文補足。

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需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楊維真老師，雖然楊老師接任系主任後十分忙碌，但老師總是會撥空翻閱我的論文，並來信以及親自與我討論修訂的方向以及細節。事實上，這本論文無論是題目、章節架構或是徵引資料上，楊老師均提供了很多寶貴的建議，而我在寫作過程中的困難也有所解決，實在很感謝老師的指導。另外，口試委員林桶法與李君山兩位老師也對論文提出了不少觀點與指正，透過與兩位老師的討論與心得交流，讓我在論文的修訂上有了明確的方向，並進行補充以及修繕的工作。其他尚有許多關心我的老師，一併感謝他們。

其次，除了師長們的鼓勵以外，家人與朋友的支持也是我完成這本論文的動力來源，尤其是親人的包容與諒解。以及，研所的學長姊（東霖學長、智誠學長等）也時常分享他們的寫作經驗，讓我在寫作上更加得心應手，碩班的同學們（先佑、彥勳、秀美等）則扮演著聆聽者的角色，使我在面臨壓力時總能找到舒解的管道。

最後，我要感謝最親近的家人（父親、哥哥），他們一同陪伴我走過這段苦澀的日子，使我在寫作上不會感到寂寞，他們對我的支持與體諒我全都感受在心裡。

我想，就用這本論文獻給我的家人以及所有關心我的師長、同學與朋友們，最後，得之於人的東西太多，出之於個人的東西太少，那就懷抱一個感恩的心吧！

## 目錄

### 章節

<b>第一章緒論</b>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3
第三節 章節內容 .....	5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資料 .....	8
<b>第二章熊式輝的崛起</b> .....	11
第一節 熊式輝的發跡 .....	11
第二節 漸成軍、政要角 .....	20
<b>第三章出任江西省主席</b> .....	27
第一節 江西的形勢 .....	27
第二節 從軍人至省主席 .....	34
<b>第四章贛政建設</b> .....	40
第一節 省政經營 .....	40
第二節 協同剿共 .....	45
第三節 共赴國難 .....	56
第四章 力倡教育 .....	61

第五章結論.....	64
------------	----

徵引書目.....	67
-----------	----



## 摘要

東南 5 省被視為北伐之後國民政府的根據地，對江西省的掌控更是被蔣中正視為重點，鑒於江西的重要性，國民政府乃將江西省的黨、政大權加以結合，並以熊式輝主持之，熊式輝則是從北伐前便進入國民政府核心，後來主掌江西省政長達 10 年，並被視為(贛政十年)，熊式輝被望能運用其過往的軍校完整的歷練將江西共黨給予剿清，並於後作為抗日堅實堡壘。

在治理江西方面，熊式輝由多方面下手，不管是對抗共黨的農村改革，亦或是在地方基層組織的動員，保安團的設置，三保政策施行；或是在剿共到一段落，負責抗日作戰前對於交通、教育、經濟、黨務的建設或是改革，分析這些舉措效用性如何，並可以作為國府治理東南地區的個案研究，從中探討國府及熊式輝的成敗之鑑。

本文即欲以熊式輝的角度，來探 1931~1941 熊式輝於江西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作為，同時亦將熊式輝江西省政一檢視，以期能在熊式輝的研究上有所簡單貢獻，本文並試圖研究，給予熊式輝治理江西給予應有的歷史定位和評價。

關鍵字：熊式輝、江西、贛政十年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華民國建立以來，因內憂外患，戰爭不斷，造成軍人數量的激增，軍事問題層出不窮，深深影響民國的發展。因此，軍人和軍隊領導人的研究也變得重要。

自民國創建後，中央和地方勢力互動複雜，學界對此論題的探討多半將重點放在蔣介石與地方實力派的關係上。<sup>1</sup> 蔣從 1924 年黃埔建軍開始掌握軍權，北伐後更主持全國政權，軍事權從此凌駕行政權之上，形成國民政府治理上一大特色。南京時期（1928-1937），國府對中共所占領的蘇區進行多次圍剿，而中共則展開所謂的反圍剿，戰火乃蔓延許多地方，戰爭因而與社會、軍人、民眾建立密切關連，軍事、軍人亦飽受社會的影響。在戰場上，雖以軍人的犧牲、指揮官的判斷及戰略、戰術運作左右戰場勝負，但所有軍事行動都需要社會及人民的支援才能進行下去。加上以蔣中正為主的國民政府其控制力是由東向西發展，所以國府控制力向外延伸的第一個省區江西，它的治理就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將就熊式輝對江西省政的十年經營（1931-1941），探究軍人主政的利弊得失。

本文研究動機有三：首先，為何選擇江西。就地理位置而言，江西位於長江中下游南岸，東有浙江省與福建省，北鄰安徽省和湖北省，西為湖南省，南靠廣東省。境內最大河流為贛江，贛江由南到北流經整個江西省。自秦漢以來，江西就是魚米富饒之鄉。到了唐宋，更是經濟繁榮，人才輩出，唐宋八大家中有三家為江西人士；當時江西糧、茶、造船和銀銅冶煉等都在全國領先地位，成為重要的財賦重地。明清之後，江西發達的經濟也促進文化發展，景德鎮瓷器聞名中外，凡此均可看出江西的歷史重要性。再加上北伐以後，東南五省(江西、江蘇、浙江、安徽、福建)被視為蔣中正及國民政府的根據地，江西可說是國府統治的核

---

<sup>1</sup>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台北：商務印書館，2009 年），〈導論〉，頁 v。



心省分，其領導人的選擇更顯重要。

其次，對於政府治理，領導人的選擇極為重要，因此本文研究動機之二在於探討熊式輝如何以軍人身分主政江西。熊式輝，江西安義人，其不僅出身江西，即連政治生涯和軍事作為亦與江西脫離不了關係。先後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軍事資歷堪稱完整。然熊式輝並非蔣中正嫡系將領，其被蔣重用在於 1927 年蔣中正指派成功招撫贛軍軍長賴世璜，並協助將賴部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 14 軍，<sup>2</sup>北伐因而得以順利進行，乃開啟與蔣的長年關係。從北伐受蔣重用，以迄國民黨遷台，其間二十餘年熊式輝都置身於政治權力中心，可說是蔣少數非嫡系的重要要員。此外，熊式輝在政治上被視為政學系要角，與楊永泰、黃郛、張群等人交好。自 1931 年熊式輝接任江西省主席後，1933 年楊永泰擔任蔣中正南昌行營秘書長兼政治廳長，而熊式輝則兼任行營辦公室主任，使南昌行營政治廳實際上掌握行政大權。楊永泰、熊式輝及張群被稱作新政學系三巨頭，他們為蔣中正出謀劃策，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作為剿共的實際政策，發動圍剿中共策略，並在江西制定改革行政制度、整飭紀綱、訓練民團及實行新生活運動等措施，使新政學系身價大增。熊式輝與這些政治人物的互動、言行，很值得進一步深究。

最後，抗戰前江西是中共中央蘇區的主要根據地，熊式輝如何協同進剿中共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三。自 1930 年代開始，由於紅軍在贛南的出色表現，使得江西成為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路線的重心，江西共產黨數目也開始急遽擴張。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對江西蘇區進行清剿。自 1930 年至 1934 年四年時間，江西剿共進行五次，由於第一、二次剿共並不成功，1931 年熊式輝就任江西省主席時，江西半數以上的縣已被中共控制，紅軍也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並在第三次反圍剿的過程中，於贛南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

---

<sup>2</sup> 賴世璜是否為熊式輝所策反，有兩種說法 1.賴世璜被白崇禧所陷害，賴其和汪精衛有所書信來往，並用此望以此說法來打擊蔣中正。相關內容請見賴晨，〈賴世璜年表(1889~1927)〉，《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 1 期，頁 315。2 賴世璜被中間人所陷害，和汪精衛有所牽連，又因賴人緣不佳，更加深被人落井下石的可能，因而被槍決。相關內容見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 明鏡出版社，2008)，頁 88。

中央政府，其勢有如燎原之火。熊式輝上任後，在軍事上實行「圍剿」總動員，改編地方武裝為 15 個保安團，並推行「三保」政策(保甲制度、保衛團制度、堡壘政策)，成效十分不錯，有效遏止中共根據地的拓展與鞏固。另一方面，中共實行立三路線，盲目進攻武漢、長沙、南昌等國府控制的大、中城市，無謂耗損實力，也對熊式輝的剿共政策有所幫助。最終，國民黨取得第五次圍剿的勝利，逼迫紅軍離開江西並進行長征。而在一般研究中，大多提到中共方面的失誤，較少提及國民黨成功逆轉之道和熊式輝剿共的戰略戰術，筆者希望在本論文中可以獲得初步解答。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熊式輝雖為陸軍二級上將，亦是蔣中正親信將領、心腹，但關於熊式輝的研究其實不多。

首先，以整體而來說，「熊式輝研究」在臺灣、大陸學界熱絡程度有限，成果不多，討論議題多為熊氏任東北行營主任及對蘇交涉之作為，<sup>3</sup>，對熊式輝主政江西十年時期卻討論甚少。台灣地區的相關研究相較為多，但早期基於特定思想，多以外交官和軍人形象加諸熊式輝，並將其視為新政學系要角，未能較客觀討論熊式輝的施政及作為，對於了解熊氏在江西省府政策的實行，少有幫助。

其次，有關與本論文內容相近之研究回顧：臺灣方面，多為回憶性的傳記文章，如：〈熊式輝先生傳略〉、<sup>4</sup>〈江西才子--熊式輝奇人奇事〉、<sup>5</sup>〈浪淘一將軍：

---

<sup>3</sup> 東北方面，如：萬振凡及萬心，〈熊式輝與國民黨東北接收之敗〉《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 04 期，頁 107~113；栗國成，〈張嘉璈與戰後初期中蘇關於“國民政府接收東北”之談判(1945/10~1946/4)〉，《政治科學論叢》，2003 年 19 期，頁 139~180。蘇聯外交方面，如：張令澳，〈熊式輝為何缺席慰問蘇聯紅軍的宴會〉，《世紀》，2006 年 6 期，頁 21。

<sup>4</sup> 林維成撰，〈熊式輝先生傳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輯(台北，國史館，2000)，頁 440~446。

<sup>5</sup> 王成聖，〈江西才子--熊式輝奇人奇事〉，《中外雜誌》，1995 年第九期，頁 13~17。



追憶老長官熊式輝》<sup>6</sup>、〈悼念熊式輝先生〉、<sup>7</sup>〈我對劉峙、熊式輝、桂永清三上將的粗淺認識〉<sup>8</sup>、〈熊式輝上將的功業和艱辛歷程〉<sup>9</sup>、〈悼念熊式輝先生〉<sup>10</sup>等文。此類文章多為熊氏部屬所撰或編輯眾人回憶而成，多是片段而無一整體敘述。除回憶性文章外，有關熊式輝的專書、傳記仍嫌缺乏。至於熊式輝人際關係或治理江西的相關文章則有：〈熊式輝與江西教育〉<sup>11</sup>、〈楊永泰與熊式輝——對唐德剛教授「政學系探源」大文的一件補充資料〉<sup>12</sup>、〈熊式輝與魏道明〉<sup>13</sup>、〈熊式輝政海浮沉面面觀〉<sup>14</sup>等文。由上述可知，台灣地區熊式輝研究幾乎是以文章形式論述，專書或專論方面可說是嚴重缺乏。

而在大陸方面，則有〈熊式輝主贛時期江西公路建設與經濟發展〉<sup>15</sup>等少數文章，專書也相當缺乏。

承上所言，學界雖有少數關於熊式輝施政的文章，但多針對單一政策作討論，過於注重政策本身，未能關注政策背景及後續影響，進而壓縮了研究縱深。因此，筆者將以熊式輝主政江西為研究主軸，針對其政策背景、後續影響及遭遇困境加以論述，進一步探討軍人從政現象。

第三，在重要的一手文獻上，有熊式輝本人撰寫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該書《敘言》中說，這部回憶錄取材於熊式輝自己撰寫日記的部分，「偏重在國民革命有關之事，即自辛亥革命、護國、護法、北伐、剿匪、抗戰諸役，以及大陸淪陷。凡屬於當時國家軍、政乃至黨務之見聞，皆屬身所經歷者。」<sup>16</sup>作者不但在日記中對上述每一重大事件都保存了忠實的記錄，而且對

<sup>6</sup> 夏德愷，〈浪淘一將軍：追憶老長官熊式輝〉，《中外雜誌》，1986年第五期，頁91~95。

<sup>7</sup> 林維城，〈悼念熊式輝先生〉，《江西文獻》，1975年第10期，頁33~35。

<sup>8</sup> 周重韶，〈我對劉峙、熊式輝、桂永清三上將的粗淺認識〉，《江西文獻》，1975年第01期，頁51~54。

<sup>9</sup> 周仲超，〈熊式輝上將的功業和艱辛歷程〉，《江西文獻》，1989年第04期，頁4~18。

<sup>10</sup> 林維城，〈悼念熊式輝先生〉，《江西文獻》，1975年第10期，頁33~35。

<sup>11</sup> 劉期炳、蕭衛國，〈熊式輝與江西教育〉，《江西文獻》，1997年01期，頁13~15。

<sup>12</sup> 王又庸，〈楊永泰與熊式輝——對唐德剛教授「政學系探源」大文的一件補充資料〉，《傳記文學》，1994年02期，頁57~64。

<sup>13</sup> 張勇保，〈熊式輝與魏道明〉，《大成》，1980年05期，頁15~18。

<sup>14</sup> 馬五，〈熊式輝政海浮沉面面觀〉，《藝文誌》，1984年05期，頁34~36。

<sup>15</sup> 游海華，〈悼念熊式輝先生〉，《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0年10月，頁34~41。

<sup>16</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7。

於細節的紀載都鉅細靡遺，非常適合拿來研究熊式輝與他人之互動關係。同時，歷史學者余英時也認為，「這部回憶錄的原始材料是作者從一九〇七至一九四九年的日記中摘錄出來的；日記為當時之筆，因此所記的『言』與『事』最接近客觀的真實。不但如此，日記是一天一天地積累起來的，不可能事先有任何計畫或構想，因此和自傳的性質完全不同。」<sup>17</sup>所以這本回憶錄並不會有去取之間的問題。余英時強調「本書作者雖然也有去取選擇。本書基本上由日記原文所構成，再加上作者隨時隨地引當時的函電為證，這更為回憶的可信性增添了一重保證。」<sup>18</sup>所以，熊式輝對於相關事實的紀載，應有一定的可信度。

此外，關於蔣介石的研究，亦參考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sup>19</sup>陶涵(Jay Taylor)《蔣介石與現付中國的奮鬥》、<sup>20</sup>呂芳上等《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sup>21</sup>等書。本論文期望在學界先行研究的基礎上，能對相關議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 第三節 章節內容

本文主要章節分列如下：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熊式輝的崛起

##### 第一節 熊式輝的發跡

##### 第二節 漸成軍、政要角

#### 第三章 出任江西省主席

##### 第一節 江西的形勢

---

<sup>17</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9。

<sup>18</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10。

<sup>19</sup>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局，2008年）。

<sup>20</sup> 陶涵（Taylor, Jay），《蔣中正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台北：時報文化，2010年）。

<sup>21</sup> 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台北：商務印書館，2009年）。

## 第二節 從軍人至省主席

## 第四章 贛政建設

### 第一節 省政經營

### 第二節 協同剿共

### 第三節 共赴國難

### 第四節 力倡教育

##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章 緒論

敘述本文研究目的與動機，回顧過去研究成果，介紹研究方法、資料，以及本文章節架構。並兼述江西省的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提出本論文想解決之重點以與相關問題。

### 第二章 熊式輝的崛起

本章為「熊式輝的崛起」，將運用《熊式輝回憶錄》的記載及〈江西文獻〉和其他文章，輔以《蔣檔》與《國民政府檔案》相關電文，加上傳記及回憶資料，說明熊式輝的崛起。本章預定分為二節，分別是「熊式輝的發跡」與「漸成軍、政要角」。

第一節「熊式輝的發跡」，介紹熊式輝的成長背景、投身軍旅及北伐時期初露頭角的過程，並且討論其家庭教育與軍校教育給予的性格養成。

第二節「漸成軍、政要角」，探討熊氏成為蔣中正重要心腹後升遷的過程、擔任的職位及其重要性。進而分析熊式輝如何策反賴世璜，並在賴死後如何說服蔣讓其主掌江西，以執行蔣「攘外必先安內」之戰略。

### 第三章 出任江西省主席

本章為熊式輝接掌江西的過程，並分析江西存在哪些困難，經濟、人事佈置是否有難處、治理理念是否與地方派系產生衝突，人事部署與省政治理如何推動。

本章分為二節，分別是「江西的形勢」及「從軍人至省主席」。

第一節「江西的形勢」，分析自晚清以來，江西省所面臨的困難、機遇與挑戰，藉以鋪陳熊式輝主政江西的背景。

第二節「從軍人至省主席」，熊式輝在 1931 年接任江西省省主席後，最重要的是建設江西，而後的十年，也有所謂「贛政十年」(1931~1941)之稱，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面均有所發展。本節將討論熊式輝在出任省府主席之後，對於江西省政建設的規劃與展望，熊氏想在江西實踐怎麼樣的目標，以及如何因應此目標做出相關的安排與設置。

#### 第四章 贛政建設

本章為本論文的重點，主要探討熊式輝在江西的建設事業。熊式主贛後，以發揚民氣、掃除弊端、整肅官常、健全制度為職志，在扶持農業、加強教育、衛生管理、交通建設、運用民力等方面都頗有作為。未幾，熊式輝也捲入剿共戰事，尤其在第四、五次剿共過程中，熊式輝對於軍事決策和政治戰略都有重要的貢獻。隨著抗戰爆發後，熊式輝也捲入抗戰洪流，江西也成為抗戰前線，熊氏積極動員民眾共赴國難，尤其在文教建設上不遺餘力，致力於凝聚民眾抗敵意志。本章共分四節，分別為「省政經營」、「協同剿共」、「共赴國難」及「力倡教育」。

第一節「省政經營」，探討熊式輝主持贛政以來，在江西的各項建設事業，藉以探討熊氏治理江西的得失。

第二節「協同剿共」，自從蔣中正於 1932 年復職再起，尤其是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剿共」成為蔣的核心戰略。為了進剿江西蘇區，蔣除了集結中央軍主力、調整剿共方略外，還極力拉攏與蘇區地緣相近的兩粵參與圍剿。在剿共的中心思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中，熊式輝對於此戰略如何理解？如何執行？熊氏如何經理軍費、糧食等事務，以及南昌行營在剿共中的作用，亦將是本節探討重點。

第三節「共赴國難」，隨著第五次圍剿結束，江西剿共告一段落後，對日備戰成為中國首要之務，國府並先從共產黨收復地區進行復原工作，以備對日抗戰



所需。1937 年抗戰爆發後，熊式輝亦隨同國人共赴國難，投身抗戰洪流。此時，江西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熊式輝不論是推行德國魯屯道夫將軍之《全民族戰爭論》，希望中國以普魯士為借鏡，或是在縣以上行政機構建立與黨政之關係，都有一定的論述，並積極落實於戰時省政上，以支撐中國的長期抗戰。

第四節「力倡教育」，抗戰期間，熊式輝不僅在經濟上盡量減少省府支出並化繁為簡；並且在教育方面，藉由成立國立中正大學以貫徹中央教育理想，並推行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期望以三民主義凝聚人民思想，共同抗日。

## 第五章 結論

在前述研究基礎上，本章將對熊式輝在江西的政策成效作一綜合評估，希望找出其施政是否達到預期目標？若未達到，問題又在何處？江西省環境的特殊性，是否阻礙熊式輝推行施政？熊式輝或是國民政府在哪方面出了差錯？熊式輝政策成功的原因為何？與他人互動造成哪種變化？這些都是筆者試圖論述之處。

##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資料

由上述可知，關於熊式輝之研究大多為回憶式文章，較缺乏專業系統性的論述。因此，本論文將以史料研究、分析為主，並大量蒐集、參閱相關檔案資料。此外，將廣泛收集當事人、相關人士回憶及二手研究成果，再佐以原始檔案、文獻與二手研究成果交互分析，以作為本文主題論證之基礎。以下將就國、共雙方檔案、資料再做進一步說明：

### 國府資料

就檔案史料來說，首要資料當為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中的《事略稿本》、〈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文電〉、〈特交檔案〉、〈籌筆〉，以及《國民政府檔案》。由於熊式輝與蔣中正關係極為密切，也是其心腹之一，所以蔣在做決策（特別是江西剿共）時會參酌熊式輝等人之意見；而



熊式輝在江西不論建設、軍事或社會發展等建設，都會告知或詢問蔣中正意見，並且完全執行蔣所交付的任務。所以從《蔣檔》中，或可探明熊式輝在江西的各項施政，以及蔣在重要決策時熊所陳述的意見。

相關回憶錄則有：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劉峙，《我的回憶》、王世杰，《王世杰日記》、徐永昌，《徐永昌日記》、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等可供參考研究。

至於其他資料，報刊有《申報》、《大公報》、《中央日報》及《江西文獻》可供研究，另輔以民國時期出版的江西省各地方誌。本文極其重視熊式輝與江西剿共之關係，熊式輝率軍作戰可能稍有不足，但在決策和部隊指揮上則有一定的成果。這方面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編印的《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下兩冊，給予筆者一定程度的幫助。

## 共方資料

有關中共江西蘇區的論著，在台灣方面：郭華倫《中共史論》<sup>22</sup>、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sup>23</sup>這兩套書是研究中共之經典研究。此二書史料係以中共原始資料為主，包括其檔案、祕密的和公開的書籍、雜誌和報紙，同時，亦參閱非共的國內外有關中共歷史論述的資料。郭華倫原係中共高幹，王健民則生長於憂患中國，皆有親身的經歷與深刻的體會，他們的史著往往能將中共長年歷史做真正有系統的論述。

大陸方面：專研中共革命史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道炫著有《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sup>24</sup>一書，此書為有關中共中央蘇區之最新研究成果，內容主要圍繞 1933 年的五次剿共與反圍剿戰爭時期，中央蘇區之情況。作者以扎實的材料、嚴密的邏輯充分說明，中央蘇區後期反圍剿的失利，既有主觀的原因如左傾路線等的作用；也有客觀的因素，即力量對比的嚴重不平衡等。

<sup>22</sup> 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所印行，1982 年。)

<sup>23</sup>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中文圖書供應社，1975 年。)

<sup>24</sup> 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此階段中共革命發展也有一個逐步成熟的過程，革命策略、方針的有效與否，並不與革命、不革命直接相關。

關於中共領袖、將領回憶錄和傳記方面：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sup>25</sup>、金沖及《朱德傳》<sup>26</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sup>27</sup>等著作，均可幫助筆者了解中央蘇區的發展以及中共政策的理解。

不過本論文重點仍以熊式輝在江西的省政經營為主，中共蘇區發展僅是本論文之一小部分。

筆者希望在研究資料上能以檔案為主體，文史資料和回憶錄為輔，使得本篇論文有所本，論述更加完整。同時，本文亦參考上述「研究回顧」所羅列的相關研究成果，使本文能有堅實的敘述基礎，以力求盡善盡美。



---

<sup>25</sup>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sup>26</sup> 金沖及，《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sup>27</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 第二章 熊式輝的崛起

1840 年代到 1900 年代，中國產生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和弊端，不管是在制度、人事、教育、器物等方面，都有亟待修補改革之破洞。而不管是受到外力衝擊或是人為因素，時人大都支持中國進行改革。改革的方式一般可分為兩種：一種為只求進行現狀改變，輔佐現任統治者在制度、人事、教育、器物等方面進行改革，其組成分子主要為官員、紳商等，名為立憲派，其目的在於創造君主立憲政體，採取之行動為立憲運動；另一種為取代現有統治者，重新樹立新的制度、人事、教育、器物等，建立新體制以解決所有問題，其目的在於推翻清廷統治、創建共和，組成分子大多為留學生、會黨、秘密份子等，採取之行動為革命。身處此一大時代的背景下，熊式輝的早期生涯對其走上治理江西之路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熊氏對於辛亥革命爆發的處理態度便是本章研究之重點。本章除探討熊式輝的發跡及其入主江西的經過外，也藉由研究江西地形及北伐前後的江西形勢，以瞭解江西的戰略地位，並分析中央為何視江西為戰略要地。簡言之，即以熊式輝、江西、中央三方進行探討。

### 第一節 熊式輝的發跡

熊式輝在其生活背景、學校學習、同濟影響等各種因素影響之下，走向革命的行列，本節主要是說明熊式輝加入同盟會的機緣，以及參加革命的心路歷程。而參加護國以及護法運動，則對熊式輝革命思想和行為有極大影響。至於進入保定軍校及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可用以加強熊式輝軍事及思想方面的不足；在學期間陸續加入軍隊從事訓練工作及軍事教育，對於熊式輝增加其軍事歷練、磨練軍事技巧、統帥及教育部隊，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故而，從入學軍校至北伐前期這段時期，可以稱做熊式輝奮發躍起之時期。

## 一、早年家庭與教育

熊式輝，字天翼，江西安義人，清光緒十九年(1893 年)生。<sup>28</sup>其父於清政府江西巡撫衙門充當「門前稿」，<sup>29</sup>家境並不富裕，但熊式輝自幼聰敏，七歲時父親便將其送入私塾，學習四書、五經，<sup>31</sup>對於日後之思想、言行都有影響。1907 年考入江西陸軍小學堂，在小學堂就讀時，吸收一些新知，思想也開始趨向維新，並崇拜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認為政治制度需要改革。<sup>32</sup>有見於清廷腐敗，曾在一次作文習作中，引用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檄文之語：「忍令上國衣冠，淪下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sup>33</sup>以明心志。此語雖被老師塗改，並訓以重話，不得再犯，但幼小心靈已伏下革命的種子。因此，自從就讀小學堂開始，熊式輝便常聽到社會上、學校中對於孫中山以援手天下之思想，<sup>34</sup>進而啟發熊氏參與革命、加入同盟會的想法。1911 年畢業後，升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堂就讀，<sup>35</sup>並與粵籍同學李章達、袁熙圻等人相遇，經常討論國內外形勢及革命情況，逐漸對於國內外局勢有了深入的瞭解，也對孫中山生平與其領導革命之概要更加明白，確定「推翻滿清為革命之開始，但實行革命非先有黨不可」<sup>36</sup>，乃經輾轉介紹加入同盟會，正式參與革命行列。

熊式輝首次的革命活動，就是參加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後，熊氏即與同學搭便船前往武昌，參與起義，並於日記中記載：

**其時肄業於南京陸軍學堂，聞悉乃與同學李章達、袁熙圻等相約前往參加，於農曆八月二十八日由下關登輪，參加張竹君女士率領之上海紅十字**

<sup>28</sup> 林維城，〈悼念熊智輝先生〉，《江西文獻》，1975 年 10 期，頁 33。

<sup>29</sup> 王成聖，〈江西才子--熊式輝奇人奇事〉，《中外雜誌》，1995 年第九期，頁 13。

<sup>30</sup> 門前稿相當於今日收發或是傳遞之人員。

<sup>31</sup> 朱漢國、楊群主編，《中華民國史》第 3 冊 — 傳 2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461。

<sup>32</sup> 王成聖，〈江西才子--熊式輝奇人奇事〉，頁 13。

<sup>33</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 年)，頁 71。

<sup>34</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2。

<sup>35</sup> 周仲超，〈熊式輝上將的功業和艱辛歷程〉，《江西文獻》，1989 年第 04 期，頁 4。

<sup>36</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1。



會救護隊前往，並化裝為男護士，以掩沿路檢查。同行者有崔雲從、朱家驊等。船過無錫乃悉黃興、黃堅白二氏亦在船中，而與交談，一見如故。

37

雖然到達九江之後，便已知九江於 10 月 23 日被李烈鈞所起義光復，<sup>38</sup>而在其間的隱姓埋名和易容換裝，更讓熊式輝深覺革命任務之苦和躲避官方查緝之心靈懼怕；但是，與革命軍大元帥黃興會晤甚歡，並被黃興譽為志士，<sup>39</sup>也讓熊式輝及其他同學大為興奮。而在船隻到達九江時，見兩岸白旗高舉，人民對革命人士的歡呼，讓熊式輝覺得「一時心情之愉快，真生平所未曾有」<sup>40</sup>，更堅定了熊式輝支持革命之心。

武昌起義雖然成功，但黃興在軍事方面受到馮國璋北洋軍隊之壓迫，在政治方面受到湖北革命當局之排擠，並沒有當上革命軍總司令，<sup>41</sup>並因負敗戰之責準備離開武漢，使得許多參加學生軍的人士包括熊式輝在內，也都準備離開武漢。在多方想法的抉擇下，熊式輝決定回到自己家鄉江西，此時可以其所寫的一首詩闡明內心想法：

革命方開始，我何能自己。必遂平生願，驅逐遼東豕。重建漢官儀，祇待一彈指，中道附蓬萊，嫌納瓜田覆，溝壑念在茲，志士不惜死，憤懣固難忘，感恩非知己，寧過美人關，毋後英雄恥。<sup>42</sup>

本首詩題名為《辛亥十月九江絕某女士邀約赴日本續讀》，本意係熊式輝自

<sup>37</sup> 熊式輝，《熊天翼日記》，頁 6，收入於周仲超〈熊式輝上將的功業和艱辛歷程〉，頁 5。

<sup>38</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4 年)，頁 62。

<sup>39</sup> 雖說與黃興相談甚歡，但是在當下熊式輝並不知道與其談話之人為即將赴武漢之革命軍總司令，直到船過了九江才由人所告知。參見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2。

<sup>40</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2。

<sup>41</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4 年)，頁 64。

<sup>42</sup> 魏向炎，〈從《雪松吟草》看熊式輝的一生〉《江西文史資料選輯》，1989 年第 30 期，頁 41。



遣於漢口無可為力，一方面軍事知識不足以幫助戰鬥，一方面又與黃白堅同行的某女士相談甚有默契，對方要求熊式輝一同前往日本續讀，熊氏在多方考慮之下回絕其邀請。<sup>43</sup>但是，也可看出熊式輝在僅僅 18 歲時，即有「寧過美人關，毋後英雄恥」之革命意志，以及其志在推翻反清，擁有建立民國的青年熱血，這也是熊式輝初入革命戰場的開端。

## 二、接受軍校薰陶

1911 年 12 月，熊式輝回到南昌江西都督彭程萬底下擔任江西都督府參謀一職，<sup>44</sup>但是，一如武漢，南昌當局並沒有甚麼像樣的作為。且看到：

**而是市中常見有紅江會人驕縱橫行，綱紀掃地，不似有開國規模，自顧人微言輕，而亦委實無合長策可為貢獻。<sup>45</sup>**

從上述回憶可以看出，熊式輝對於當下感受十分氣憤，因為沒有什麼策謀可改變江西吏治敗壞的狀態。最後，熊式輝選擇解決的辦法則為繼續讀書，乃於任職都督府參謀一年多後，報考南京陸軍學校。後因南北尚未統一，軍事教育仍由北洋中央政府統籌，南京陸軍學校停辦，乃轉讀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畢業後，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就讀，敘期保定軍校第二期。<sup>46</sup>1916 年軍校畢業，分發至山西見習，<sup>47</sup>並在日記中記載：

**革命需要讀書，讀書仍為革命，民國成立，雖經五載，而去革命之目的尚遠。學業粗成，遂決心獻身於革命事業。**

<sup>43</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3。

<sup>44</sup> 史政局，〈熊式輝自傳〉《江西文獻》，1989 年第 136 期，頁 3。

<sup>45</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4。

<sup>46</sup> 林維城，〈悼念熊智輝先生〉，《江西文獻》，1975 年 10 期，頁 33。

<sup>47</sup> 周仲超，〈熊式輝上將的功業和艱辛歷程〉《江西文獻》，1989 年第 04 期，頁 5。

如同上述所言，熊式輝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之後，便有獻身革命工作的決心，後來並投入兩次革命行動——護國及護法之役。

在河北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其主要目的是造就陸軍初級軍官，並實施應有的教育。在日常的訓練中，軍校學生須嚴格遵守值勤、檢查、考試、休假等制度；在課程方面，有學科與術科之分，學科包含軍事、國文、外國語言與典範令服務提要；術科則有教練及野外勤務、射擊、騎馬與各兵種的分科演習等，此外有定期考查學科及品行之制度。學科方面，有 2 科以上不合格者即降級處分，降級兩次者即退學處分；品行方面，有違反規則以致退學者，更是馬上開除。<sup>48</sup>因此，保定軍校的訓練對於軍官養成成效是相當顯著且嚴格的，保定軍校出身的軍官爾後大多身居軍事要職。熊式輝在校時，為步科 2 期 2 連，與劉峙、賴世璜等人為同期同學<sup>49</sup>。在軍事課程之外，熊式輝也研讀《王陽明集要》等三種書籍，並在日記中稱：

……為內心之景仰，在昔為孔子，於今又及於孫先生。於孔子余時猶有儒家缺少法家精神之妄議，於孫先生則無閒言，總以為其是數百年來，應運而生，可以推倒滿清，中興華夏之唯一革命領袖。余未見其人，亦不曾讀其書，要亦孫先生革命精神之所感召。<sup>50</sup>

由此可知，熊式輝在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就學當時，心中已產生對於傳統儒家思想的反思，反而較貼近法家思想，並被孫中山所感召，再次踏上軍事旅途。而同期保定軍官學校江西籍同學有劉峙、賴世璜等人，這些同學對於熊式輝日後作為及行動亦有所影響。

<sup>48</sup> 鄭志廷、張秋山，《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200~201。

<sup>49</sup> 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等編，《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98。

<sup>50</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4。

### 三、正式投入革命

#### (一) 護國運動

自從民初北洋政府由袁世凱掌政後，繼之有二次革命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乃意圖推翻共和，準備重建帝制，尤以 1915 年更甚為劇。袁世凱公然於當年 12 月接受君主立憲政體，並自受帝位，進而引發雲南起義，組織護國軍，各省紛紛舉兵響應。同時，孫中山於 1914 年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以倒袁為主要目的，沿襲 1913 年失敗的二次革命，並將此次革命行動稱為「三次革命」。<sup>51</sup>

中華革命黨由總理孫中山號召海內外志士共同起兵討袁，未幾，雲南就組成護國軍，分由蔡鍔、李烈鈞、唐繼堯任護國第一、二、三軍總司令，出兵川、黔，掀起護國風潮。此刻，熊式輝甫從保定軍校畢業，準備分發至山西見習，後因聞孫中山在肇慶編練革命軍，因而放棄原分發地，轉往廣東肇慶，準備投靠肇慶督司令岑春煊。不料事與願違：

**抵達琵琶江，方知肇慶都司令是岑春煊，而孫總理並不曾蒞此，更無練兵之事。當時途中邂逅護國軍第二軍方聲濤之團長朱培德，及在兵站任職之同學賴世璜，余乃就近投效於第二軍總司令部，參加護國軍工作，進擊廣州。**

52

熊式輝本意加入肇慶督司令岑春煊之部隊，並以放棄原分發地，結合同學及有志之士一同前往投效。至廣東時遇到由李烈鈞護國第 2 軍方聲濤師之團長朱培德、及在兵站任職之同學賴世璜，就改變決定投靠其部隊，於第二軍總司令部參加護

<sup>51</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4 年），頁 117。

<sup>52</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5。

法工作，直到龍濟光被護國軍逐出廣州後，護國軍階段性任務結束，護國軍改編為駐粵滇軍兩師，熊式輝乃轉入部隊，在廣州，擔任第 4 師 34 團 8 旅中校團附，負責整理及訓練工作。<sup>53</sup>

## （二）護法之役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之位繼任總統，皖派首領段祺瑞擔任總理。爾後，段祺瑞內閣的施政措施常不能與黎元洪的想法相符，政局陷入紛擾局面；且段祺瑞有獨斷中央權力之意，由府院之爭開始。段祺瑞主張責任內閣制，欲用其和黎元洪爭權，當中尤以爭論最烈者為對德宣戰案；1916 年起，段祺瑞主張對德宣戰，而黎元洪主張相反，以主張中立為主；反對參戰的勢力尤以國會和黎元洪為最烈，但段祺瑞為了讓其參戰主張能順利實現，一方面以運作手下多省督軍，讓其組成督軍團到北京施壓，宣揚其理念；二方面先讓內閣先通過對德宣戰案；而後因國會宣布暫緩宣戰案，段祺瑞亦宣布以呈請解散國會反制<sup>54</sup>；黎元洪以總統之姿下令解除段祺瑞總理職位，以伍廷芳接任，親段督軍亦以宣佈獨立應對，並進逼北京，黎元洪迫於無奈，召安徽督軍兼長江巡閱張勳入京調停，但張勳意圖擁護溥儀復辟，並逼使黎元洪解散國會，<sup>55</sup>黎元洪不得已商請段祺瑞復職，追討張勳，張勳因此失敗被逐出北京，段祺瑞借口挫敗張勳復辟是再造共和名義，<sup>56</sup>段祺瑞便開始獨掌大權，段祺瑞便宣布參加歐戰，但是私自以宣戰名義進行軍事借款加強私人軍隊，並假借民意成立新國會，把持軍隊和新國會臨時參議院。

1916 年 7 月孫中山乃對於段祺瑞不恢復舊國會及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不滿，集結舊國會議員和海軍南下至廣州提倡護法，並組建中華民國軍政府，任職為大元帥，熊式輝並回憶道：

---

<sup>53</sup> 周仲超，〈熊式輝上將的功業和艱辛歷程〉《江西文獻》，1989 年第 04 期，頁 5。

<sup>54</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4 年），頁 161。

<sup>55</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4 年），頁 162。

<sup>56</sup> 費正清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67。



……七月孫總理乃到廣州提倡護法，國會議員群集廣州，舉行非常會議，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孫總理為大元帥。大元帥由黃埔乘艦來廣州就任，在東堤登岸，當時僅有余率部隊到碼頭迎接，鼓號兵亦祇數民而已……革命事業，原在披荊斬棘，天數難憑，人事為重，護法前途，就今天天氣卜之，應可樂觀之。<sup>57</sup>

熊式輝對於護法運動擁護是積極且樂觀的，而北洋軍分兩路向廣州進軍；一由湘南窺北江，一由閩南侵潮仙；閩南方面則以浙軍第 2 師為主力，熊式輝當時為代理團長，負責阻擋浙軍 2 師進攻，守護廣東饒平平墟嶺地區；和張治中的步兵一營和張善群的砲兵一連；<sup>58</sup>一同交戰由伍文淵領軍之浙軍第 2 師旅，而在拂曉攻擊前，伍文淵遣軍使前來招降，這方面由熊式輝連長張善群作書答之，洋洋千餘字，內容提及「北京政府，喪權辱國，借款購械，塗炭生民，欲以武力求統一」；「公等手執日械、囊攜日款，來與同胞殘殺」；「北方軍閥是南方軍隊(包括浙軍在內)如眼中釘，肉裡刺，苦於消滅無方，今令公等南來，正是其以毒攻毒之狡計，浙軍侵粵，拜自散亡、勝一殘破」；「粵中護法之軍，乃為救國家於顛危，拯人民於水火，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今日呻吟於北方軍閥暴政之下的人民，正應簞食壺漿以迎，公等如何猶忍心害理，勞師遠出，犯及粵邊，既已認賊作父，且將認父作賊矣，既不言是非，寧不計及利害」<sup>59</sup>等言。送去後，伍文淵大驚，認為革命軍下級軍官都能書寫這樣一手漂亮文章，如何可與之爭勝；爾後並有數千部隊前往投降，再加上浙軍陳肇英團長陣前起義領兵投靠，潮仙方面得以平定，熊式輝之奉命扼守饒平之工作也得以成功。

從 1918 年廣州軍政府成立，一直到 1921 年 4 月國會召開非常會議，決議改組為中華民國非常政府，並選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在軍事上除了廣西

<sup>57</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6。

<sup>58</sup> 伍立楊，《革命!中國 1911》(台北：新稅文創，2011 年)，頁 302。

<sup>59</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7。



陸榮廷的虎視眈眈及陳炯明受賄之叛變<sup>60</sup>外，革命軍雖有于右任靖國軍在陝西，許崇智在兩粵，湖南之譚延闓，福建之李厚基等，但是各有部分的實力，皆難以掌控，導致護法軍事行動難以統一行動；在政治方面，孫中山屢屢強調其護法護國之主張，但是隨著民國 9 年譚延闓利用吳佩孚的撤防，將駐守長沙的張敬堯逐出之後，並宣布湖南自治之後，風行各省的一省自治及聯省自治理論便如荼如火開始展開，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政治界，論著或是理論皆開始大放異彩，而在民國 10 年 5 月的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宣言當中，也迫於輿論不諱言地提到聯省自治之精神；<sup>61</sup>但是，就如同首任湖南省務院院長李劍農所言：「在實施省憲的兩三年內，所謂省憲也僅僅具一種形式，於湖南政治的實際未曾發生若何良果。」<sup>62</sup>聯省自治變成軍閥遮掩割據之實的障眼法，所以不管是在軍事或是思想上，皆難以同時間向適合方向前進。而且在和平談判方面，南北和議的會議進展也不大，而和會發出宣言、表達意義亦斷斷續續，難有共識，各省狀態也難以掌控，南北軍閥戰禍亦頻傳。

#### 四、前往日本陸軍大學

在 1918-1921 年間，中國的政治、軍事、思想各方面都可以說是一片混亂。而在這混亂中，熊式輝意圖要找出一些真理。熊氏對於本身政治、思想也有所疑惑，曾謂：「革命不是徒手暴虎，徒步馮河之事，需要真知，方能力行，然後可以完成。」<sup>63</sup>可知熊式輝對於尋求真理知識的渴望。恰好 1918 年日本陸軍大學限定限額招收 10 名中國留學生，熊式輝乃向政府爭取北方 7 名、南方 3 名之名額，<sup>64</sup>南方由時任護法軍政府參謀部參謀總長李烈鈞所選定之三人：熊式輝、曹浩森與陳銳前往日本留學，但因交涉問題及補習日語之耽擱，延遲至 1921 年才

<sup>60</sup>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2004 年），頁 184

<sup>61</sup>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22。

<sup>62</sup>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 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 9 月），頁 490。

<sup>63</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9。

<sup>64</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79。

成行。<sup>65</sup>

如果說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訓練，培育了熊式輝軍事學基礎，那麼日本陸軍大學則提供熊式輝學習更高深的軍事學素養。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除了清末各省講武堂等軍事學校、民初成立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國共合作成立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外，為培養近代中國軍事人才四大學校其中之一；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軍官學成歸國後，大多成為前三大軍事學校的師資，他們在近代中國軍事永續發展及國家獨立自主的過程中，占有極大的分量。<sup>66</sup>況且，民初軍人能於國外陸軍大學畢業者為數並不多，熊式輝於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對其爾後成就產生重大影響。

熊式輝於 4 年後 1925 年學業完成返回中國，回國之後本預期和同期同學曹浩森一同與張作霖、馮玉祥方面連絡，為其職掌軍事事務；但因孫中山過世及南北局勢不如預期和睦<sup>67</sup>，乃改變計畫並應國民二軍岳維峻所邀，前往河南督軍府擔任參議一職。<sup>68</sup>爾後因和岳維峻多次摩擦，遂應廣州建國滇軍總司令朱培德邀請，前往廣州擔任建國滇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一職。其後，隨著建國滇軍軍官學校併入黃埔軍校，熊式輝和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的關係開始密切，並於北伐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第二節 漸成軍、政要角

### 一、江西戰場建立

1924 年 1 月，國民黨改組後推行「聯俄容共」政策，熊式輝此時剛好從日本歸國，人正在廣州，覺得其氣氛甚怪，在日記中言道：

<sup>65</sup> 王又庸，〈一個親身參與者筆下的政學系兩巨頭-楊永泰與熊式輝--對唐德剛教授「政學系探源」大文的一件補充資料〉《傳記文學》，1994 年第 64 卷 2 期，頁 62。

<sup>66</sup> 楊典錕，〈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畢業生為中心的分析〉《臺大歷史學報》，2012 年 6 月第 49 期，頁 48~49。

<sup>67</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80。

<sup>68</sup> 胡建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20 輯，頁 440。

當時政府決策是聯俄容共，而各機關之俄顧問，以及政治部之共產黨人員，飛揚跋扈，大有喧賓奪主之勢，其時我政府人之講話亦常有「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三民主義」之語，人情惶惑，惴惴忸忸，識時者有引狼入室之嘆，共黨氣焰，實屬可慮。<sup>69</sup>

由上文可看出，熊式輝對於聯俄容共政策，俄國顧問、中共人員佔據各重要單位，以及宣傳共產黨思想、共黨氣焰高張均甚不以為然。不過，熊式輝也表示北伐重點在於「用人善用」，此時與俄國絕交是因噎廢食。而國民黨為了準備北伐並組建一支由黨指揮的軍隊，於是有黃埔軍校的籌備，熊式輝時任建國滇軍軍官學校教育長，負責幹部培育及軍隊訓練，爾後該校併入黃埔軍校，北伐初期熊式輝主要亦從事訓練工作。

1925 年 7 月 1 日，國民政府於廣州成立，隨即成立軍事委員會。8 月，將廣州各軍改編國民革命軍，改編部隊詳看下表：

部隊原劃分	改編部隊名	軍長
黨軍	第一軍	蔣中正
建國湘軍	第二軍	譚延闓
建國滇軍	第三軍	朱培德
建國粵軍	第四軍	許崇智
建國粵軍	第五軍	李福林
建國粵軍	第六軍	李濟深

參考資料：劉鳳翰，《黃埔建校與北伐》（台北：黃慶忠出版，2008 年），頁 91~95。

<sup>69</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82。

1926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蔣中正在大會作軍事報告時提到：

最後要報告今後軍政的進行計劃，現在的國民革命軍，完全在政府的管轄之下，一個命令出來，可以動員的人數有八萬五千人，槍械也有六萬桿，兵士的餉銀，有一定的預算，……用些精神積極整頓，本黨的力量，就不難統一中國。……總括起來說，有十三年積極的準備，才有十四年統一廣東的成績，我們從今以後只要接受總理的遺囑，繼續努力奮鬥，國民革命的成功，當不在遠。<sup>70</sup>

報告中可以看出在東征一統廣東後，蔣中正意圖承接孫中山遺願，一統中國。同年 3 月，軍事委員會即決議進行北伐之準備，同時馮玉祥亦派代表至廣州說明願和國民政府合作之意願，希望同國民軍往長江發展。<sup>71</sup>看似北伐即將要展開，然而，卻遭到共產黨及蘇聯顧問，如鮑羅廷、季山嘉與共產黨人士的阻撓，無法得到決議，甚至陳獨秀等人在《響導》發表文章堅決反對。而 1926 年 3 月 20 日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中正已牢牢地掌握領導大權，加上蘇聯顧問大部分離開廣州，汪兆銘也因病出國，共黨勢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sup>72</sup>

而熊式輝在 3 月 20 日中山艦事件爆發前，於 19 日即得到朱培德的通知，對於共產黨可能的破壞有所防備，以下為其記錄：

3 月 19 日午夜，益之軍長忽以電話約談機要，見面後，即告以衛戍司令部，本晚即將逮捕共產黨中造亂份子，囑即調遣在校員生，配置東堤一帶，

<sup>70</sup>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之蔣中正先生》，收錄於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傳集》第 87 輯，新編頁 584。

<sup>71</sup>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局，2008 年），頁 156。

<sup>72</sup> 李國祁，《民國史論集》（台北：南天書局，1990 年），頁 462。



協力戒備，擾擾終宵。翌日方知為海軍代理局長共產黨李之龍之亂，所幸小警雖虞，大變未禍。<sup>73</sup>

雖無重大的傷害，但由所言可知，蔣中正在其訊息和情報的掌握度上也是相當的快速，做出之反應也極迅速，熊式輝在蔣中正的心目中還是屬於比較小的腳色，但也為熊式輝後面回江西埋下一個伏筆。

4 月，蔣中正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建議「整軍肅黨」，並分析國民軍退出北京和天津後之模擬情勢，<sup>74</sup>建議中說到：

以後列強在華，對於北方國民軍處置既畢後，其必轉移視線，注全力於兩廣革命根據地無礙，且其期限，不出於三月至半年內也。<sup>75</sup>

蔣中正提出此建議三個月內，即發動北伐。1925 年 5 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會中通過一連串的「黨務整理案」，致使共產黨份子讓出中央黨部一級單位主管之職務，如中央黨部任秘書處書記長的劉芬、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部長林祖涵等。<sup>76</sup>至此廣州的政務、黨務、軍務皆統一，6 月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迅速出師北伐，隔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並負北伐重任。

此時的國民政府也正在加緊準備北伐，主要的戰略根據學者的研究有 2 種，分述如下：

一、革命根據地應建立於內陸，國民軍既已在西北有其強大勢力，國民政府當向西南發展勢力。因此廣西地位重要，務使兩廣合為一體，開發廣

<sup>73</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82。

<sup>74</sup>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局，2008 年)，頁 157。

<sup>75</sup> 《蔣校長建議中央請整軍肅黨準期北伐》，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中正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年)，頁 554。

<sup>76</sup> 王正華，《國民政府之建立與初期成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346。



西。之後入湖南、收雲貴，兼及四川，使整個西南與西北成為革命大本營。

二、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三大軍閥中的任一軍閥的根據地及兵力均超過國民政府，因此國民政府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不理會張作霖，聯絡孫傳芳，使之中立。吳佩孚則雄踞兩湖，為革命軍首先攻擊的目標，第一期的戰略為進軍湘鄂，攻取武漢；第二期戰略為分兵攻略江西與福建，直指寧滬，分別以吳佩孚與孫傳芳為打擊對象。<sup>77</sup>

由上述可看出，本來戰略目標為湖南及湖北並且目標是收復武漢，其次才是收復江西福建等地，對於孫傳芳而行遠交策略，吳佩孚則為首要攻擊目標；且湖南趙恆惕宣布下野時，其心腹將領葉開鑫即對唐生智逼宮之舉十分不悅，遂率部開入岳陽，並尋求吳佩孚的協助，其結果即是部分湘軍勾結北軍對付唐生智，而唐氏則轉而求援於廣州國府，加速國民黨提前發動北伐。<sup>78</sup>

第一期北伐便開始，目標為兩湖、武漢，1926年7月蔣中正下達北伐部隊動員令，頒布《湖南計畫》，國民革命軍以第4軍陳可鈺、第7軍李宗仁為西路軍，搭配唐生智部的第8軍，和湘軍決戰，目標佔領省城長沙；另一方面以第2軍譚延闓、第3軍朱培德、第6軍為東路軍，作防禦性進攻，同時監視江西的孫傳芳部隊，至於第1軍第1、2師則為總預備隊。<sup>79</sup>

在湖南戰爭中，不到一禮拜的時間，已把長沙給收復，並且第4、7、8軍持續近迫岳州，<sup>80</sup>也由於快速的進攻之下，8月中旬，孫傳芳見吳軍瀕於崩潰，決定從江蘇、浙江、安徽調兵十萬，會同駐江西部隊兩萬餘人，向南潯鐵路沿線和江西北邊境集中，企圖截斷武昌至長沙鐵路，攻取湖南、湖北，這使的革命軍腹背受敵；不得不將軍對轉向，向往江西。

<sup>77</sup> 李國祁，《民國史論集》（台北：南天書局，1990年），頁466-467。；詳見古順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研究（1917-1928）〉，《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國立中央大學，2010年），頁69。

<sup>78</sup> 蕭先佑，〈薛岳與抗戰時期第九戰區的發展（1938~1945）〉，《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臺北：國立中正大學，2013年），頁27。

<sup>79</sup>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局，2008年），頁159。

<sup>80</sup>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2005年），頁46。

江西戰場的建立，孫傳芳態度的轉變只是一個原因，蔣中正決議親自督導江西戰場更是一大原因，由下列可看出：

18 日，抵長沙，電告中央：「湖北軍事交給唐生智，民政交給鄧演達，財政交給陳公博，惟中正離鄂以後，政治恐不易辦，請中央另組政治委員會來鄂為妥。」是日，定考察人才為日課。19 日，抵萍鄉。是日，攻入南昌。<sup>81</sup>

蔣中正於 8 月親自領軍於江西戰場，可以說是江西戰場得以確立的原因；當然，細部原因不只這些，<sup>82</sup>但是，在綜合判斷下和結果上來說，江西戰場的開闢確實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而江西戰場態勢，已由作為側翼監視的地方向戰略中心做一個轉變。而北伐軍的主攻方向也由兩湖轉到江西。

## 二、熊式輝與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

從北伐進入第二階段，革命軍攻略江西戰場的主要計畫，陳誠擁有簡單的筆記：

- 一、以李宗仁第七軍扼守沿江要隘，以當陳調元部，兼顧湘鄂交界之平江通域。
- 二、以程潛第六軍攻修水銅鼓，以當盧香亭部，並以第一軍王柏齡師攻萬載，以相呼應；
- 三、以朱培德第三軍攻袁州，撥第二軍兩師助攻；
- 四、以第二軍兩師協同新附之賴世璜部(編為第十四軍)攻贛南；

<sup>81</sup>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上冊（臺北：國史館，2011 年），頁 68。

<sup>82</sup> 如蔣中正與唐生智不合也為細部原因；詳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局，2008 年），頁 163~165。

### 五、以何應欽留守潮梅部隊攻進福建，以當周蔭人部。<sup>83</sup>

文中可看見，第 4 項為利用賴世璜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 14 軍)進攻贛南地區，可以看出在江西戰場上第 14 軍占有極為重要的戰略位置。當然，關於賴世璜所部收編一事，其實早在北伐剛開始時，熊式輝便具名建議進取江西，並欲隻身前往說服賴世璜，下為熊式輝回憶：

6 月 5 日國民政府已發表任命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余即具陳進取江西策略，大要在運用原瑞金一帶之賴世璜所屬之江西第 4 師部隊附義，順流席捲贛江兩岸，直下南昌，並願請纓前往。<sup>84</sup>

熊式輝和賴世璜既是同鄉，又為保定軍校二期同學，均曾參與護國、護法諸役，又皆在軍隊工作，官兵也大多為相識舊部屬，二人本為舊識。因此，經熊式輝與之商議後，賴世璜亦同意接受改編，將所部江西第 4 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 5 師，爾後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 14 軍，賴世璜任軍長。至於熊式輝則因策反有功，經蔣中正拔擢，任第 14 軍副軍長兼黨代表。<sup>85</sup>未幾，寧漢分裂爆發，賴世璜由於涉嫌與武漢政府汪精衛書信往來，為人告發，蔣中正於下野前遂將賴世璜拘捕槍決，所遺第 14 軍軍長一職由熊式輝代理。次(1928)年初，蔣中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第 14 軍併入中央軍將領錢大鈞所部，改稱第 13 軍，由錢大鈞任軍長，熊式輝為副軍長。<sup>86</sup>1928 年 4 月，熊式輝奉蔣中正電召赴徐州出席軍事會議，並由熊氏率第 13 軍投入北伐戰事，以迄北伐結束，全國復歸統一。<sup>87</sup>

<sup>83</sup>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台北：國史館，2005 年)，頁 52。

<sup>84</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83。

<sup>85</sup> 「何應欽電蔣中正賴世璜既委為第十四軍長請速委熊式輝為副軍黨代表」，〈革命文獻—克服福建〉，《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100-00009-009，1927/ 9/13。

<sup>86</sup> 「劉峙電蔣中正浙滬防務由錢大鈞擔任請調第十三軍熊式輝部參加北伐」，〈革命文獻—蔣總司令復職與軍事佈置〉，《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100-00016-090，1928/ 2/28。

<sup>87</sup> 「蔣中正電邀熊式輝赴徐州參加軍事會議」，〈籌備---北伐時期(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

## 第三章 出任江西省主席

### 第一節 江西的形勢

江西在民國成立之後，其政治權力更迭十分迅速。由於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使得民初江西政壇領導階層頻頻產生更迭，由四換都督即可聞知，其政權輪替相當快；再加上政局分裂、南北對峙，戰事頻仍，江西領導人通常為軍人所控制。

#### 一、南北對峙之下的江西

##### （一）辛亥革命後江西情勢(1911~1912)

江西省地理位置位於長江下游南岸，北邊鄰近湖北、安徽，南鄰廣東、廣西，西鄰湖南，東鄰浙江、福建接壤，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就戰略地位來說，北控長江，上有武漢三鎮，下通南京、上海，下通廣東、廣西，就戰略地點來說也是十分重要，<sup>88</sup>並且因贛江流貫全省，故簡稱「贛」；也因位於江南之西，唐代設江南西道，因故得名江西。歷經各朝代行政區域劃分與變動，至民國政府時期，全省共有 81 縣，<sup>89</sup>作為行政劃分。

自從辛亥革命之後，結束了二千餘年的帝制和清朝 268 年的統治，但是對於江西省來說，身為全國第三個響應革命的省份，<sup>90</sup>革命對於江西省可以說是來得又急又快，而最初革命黨人主要缺乏政治管理方面的經驗，再加上辛亥革命後初期的時局並不穩定，致使江西政局一度比較混亂。此時期江西先後出現四位都督，最後由革命黨人、新軍將校李烈鈞接任，茲將李之前的三任都督分述如下：

##### 1. 吳介璋

第一位江西都督為吳介璋，1911 年 10 月 31 日於江西同盟會各界人士代表會議上，本應推舉前清朝巡撫馮汝駱為都督，但馮以不違背朝廷，尤其是不能受

---

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100-00011-018，1928/4/1。

<sup>88</sup> 《江西省情匯要》編輯委員會，《江西省情匯要》(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1-3。

<sup>89</sup> 東亞同文會，《中國省別制全誌》第 11 卷江西省(台北：南天書局，1988 年)，頁 2。

<sup>90</sup> 江西省晚湖南、陝西一天響應革命。



到各界推舉為叛國之臣，馮拒絕為江西都督；<sup>91</sup>因而 11 月 1 日吳介璋便被推舉為江西軍政府第一任都督，而吳介璋上任時還按照同盟會的要求，頒行了多項新政，如：下令男子一律剪辮，廢除作揖、跪拜等封建禮節，並成立義勇隊赴鄂增援革命軍等。<sup>92</sup> 吳介璋本來為清廷新軍 27 混成協協統一職，所以在江西軍界當中聲望十分的高，旗下所治理之部隊資質、能力也相當不錯，其實力和聲望皆十分足夠，看是江西要有所一番新作為。

但是，吳介璋從一開始就並未和同盟會有所關聯、聯繫；再加上吳介璋對前清朝江西官吏一律實行優待，並將其送歸原籍。其三，命令各道、府、廳、州、縣的官員，吏史照舊行事，且對於所有民事、刑事、教育、地方行政……等制度並不作任何改革。最後，軍隊購買軍械的費用也向民眾強徵，導致革命後的稅捐更為沉重。因此，從同盟會到百姓，都產生了強烈的反吳情緒。<sup>93</sup>

首先是由軍方內部少部分人士開始反吳介璋，以江西 55 標新軍憲兵標統馮嗣鴻為主要人士，爾後加入劉懋政的防營部隊、洪江會和混成協騎兵營排長鄒恩灝；<sup>94</sup>而吳介璋和上述反吳人士的間隙持續擴大中，終究引爆；首先由於吳介璋持續重用原清軍中重要軍事人物，使得同盟會被加以冷落，使得革命只剩下虛名，再加上，武昌革命軍戰事吃緊，武昌革命軍總司令黃興曾多次發電報，請求江西速派增援部隊前往支援，可是吳介璋遲遲不出兵。這時，曾參與武昌革命的鄒恩灝便暗自下了倒吳的決心，並且意圖擁立同為同盟會成員的彭程萬為江西都督一職。鄒恩灝便執以假造同盟會特使的名義，逕入軍政府會議當中宣讀由黃興授予彭程萬的授官狀，並且言道：

**吳都督已離職，不知去向，本會急需決定繼任人選。我在武昌曾謁見黃克**

<sup>91</sup> 馮汝駱 1908 年接任江西巡撫，並體察民情、改善稅制、推行新政，爾後於 1911 年，江西起義之後推拒為江西都督，後於九江自縊以殉清廷。詳見，《清史稿》列傳 凡三百十六卷／卷四百六十九 列傳二百五十六／馮汝駱／段 21446.[底本：關外二次本]。

<sup>92</sup> 〈辛亥革命後江西四易都督〉，南昌晚報，2012 年 8 月 6 日。第 31 版：城市周刊。

<sup>93</sup> 何友良，《江西通史 11：民國卷》（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3。

<sup>94</sup> 彭程萬，〈江西光復和光復後的政局〉《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1981 年），頁 306-307。

強先生，談到江西光復後都督入選問題。我提出彭程萬為適當人選，黃克強先生同意，並發給了印信，交我帶回江西。<sup>95</sup>

吳介璋也在不明就裡之下，稱病為理由請辭；因此，江西首任都督吳介璋在 1911 年 11 月 12 日即為上任第 12 天即下臺一鞠躬。

## 2. 彭程萬

而接下黃興印信者彭程萬為眾人所簇擁，但卻無意願擔任此都督一職務；最後，迫於無奈勉予接受，並言：

吳都督既已離職，不知去向，地方秩序不可無人負責，大家如同意我，我便出來維持幾天秩序。我一面打聽吳都督在甚麼地方，請他出來復職。至於黃克強先生的印信，我暫時不能接受。本會可以去電黃克強先生，說明今天開會情形。<sup>96</sup>

彭程萬雖在上任過程有所抗拒，但自接任後仍做出幾件有巨大影響力的事情。首先，因當時清廷仍派袁世凱北洋軍反攻武漢等地區，彭程萬將第 55 標補充成旅，派往武漢支援黎元洪部隊，並且和圍城的清軍展開戰鬥，解除了湖北革命軍的困境，且因 55 標標統馮嗣鴻認為派出 55 標去援救湖北革命軍將導致，彭程萬在江西地位不穩，因而說出「武昌如果失守，江西將會跟著失敗」<sup>97</sup>此言，並又因張勳進攻南京，再將劉懋政所領防營部隊加以補充為旅，前往支援南京戰場，<sup>98</sup>使得在武漢以及南京的革命軍能解決受到圍攻之困境；其次為下令收付萍鄉煤

<sup>95</sup>彭程萬，〈江西光復和光復後的政局〉《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1981 年)，頁 307。

<sup>96</sup>彭程萬，〈江西光復和光復後的政局〉《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1981 年)，頁 307。

<sup>97</sup>彭程萬，〈江西光復和光復後的政局〉《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1981 年)，頁 308。

<sup>98</sup>況建軍，〈江西辛亥起義功臣彭程萬〉《黨史文苑》，2011 年 19 期(2011 年 10 月)，頁 23。

礦及南潯鐵路，再加上對於留在江西境內的滿清旗人，做上妥善處置<sup>99</sup>；能看出彭程萬對於江西及革命軍都想有所一番作為之表現。

但是，形勢上的紛亂增加彭程萬在事情表現上的困難度，其一，派出 55 標部隊和防營部隊確實影響到彭程萬在江西省領導的地位；其二，防營部隊為前綠營所改組而成，並獲得彭程萬發放薪餉、彈藥、裝備和糧食等補給強往南京支援，並與早已計畫組織義勇軍前往援救南京之新軍有所嫌隙<sup>100</sup>賦予反彭之能量，而 55 標和防營部隊調出江西支援戰場後，洪江會以及江西地方盜匪便大量開始猖獗，所以彭程萬在**軍餉籌備，各屬要求，各種困難，不堪言狀**；<sup>101</sup>之情況下於 1911 年 11 月 21 日提出辭職。而當時雖然江西已獨立，但是由 5 個都督分府分立而治，互不隸屬。彭程萬都督在南昌、馬毓寶都督在九江、胡謙都督在袁州、蔡銳霆都督在瑞臨，黃金台都督在鄱陽；<sup>102</sup>其中馬、胡、蔡、黃 4 個都督分府都是于辛亥革命時期對於光復地方有功之人士所設立，而五個分府，各據一方，形成分裂之勢，使得督政難確實實行；彭程萬在辭職之前通電胡、蔡、黃三督分府，一同取消都督職位，使得江西督政得以謀求一統。而馬毓寶就在彭程萬通電以及地方人士相迎之下，就任江西省都督。<sup>103</sup>

### 3.馬毓寶

馬毓寶就任都督之後，人們對於馬毓寶有較大的期望；馬毓寶上任之後，在政治權力及統領方面，一方面大幅度改組都督府，更換部長、廳長、司長數名；另一方面，下令解散所有會黨，以維持社會秩序；而為了傾聽民意和改善前朝諮議局的功能，而於 1912 年 2 月 1 日開始運作江西臨時議會，更是馬毓寶擔任江西都督重要政績，其運作法令基準主要是由都督府參事廳制定的「江西省臨時約

<sup>99</sup> 何友良，《江西通史 11：民國卷》（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3。

<sup>100</sup> 龔師曾，〈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1981 年），頁 332。

<sup>101</sup> 《贛軍又議換都督》，《申報》1911 年 11 月 28 日。

<sup>102</sup> 龔師曾，〈辛亥革命前後的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1981 年），頁 332。

<sup>103</sup> 彭程萬，〈江西光復和光復後的政局〉《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1981 年），頁 308。

法」並由馬毓寶頒布，《申報》1912年1月份便多次以〈江西新獻種種〉和〈江西新事物紀〉等<sup>104</sup>來報導馬毓寶新政及江西省臨時約法；雖說此約法對於政府權力制衡的設計並不週全，且臨時議會彈劾能力僅具有彈劾政務員之權力而不具彈劾都督權力；但是由此約法而設立的江西臨時議會，已具有現代民意機構的色彩。

105

馬毓寶雖有實績，但是行政並不讓人滿意，<sup>106</sup>對於藉由光復有功者之擾亂騷扈多加遷就，無視幫會四處侵擾，且對屬下驕奢淫逸多加放任，使得革命黨及軍紳學商各界皆對馬毓寶漸生不滿。因而，時任江西衛戍司令朱漢濤首先被革命黨員所殺，朱漢濤之死讓馬毓寶失去重要倚靠力量；再加上1912年3月7日革命黨員及軍紳學商各界聯名指責馬毓寶「事多徇私，懶于問政，而且身體孱弱，煙癮甚巨，全省搶案層見疊出，贛人實不堪命」，<sup>107</sup>因此決議請馬毓寶自行退位，推舉李烈鈞繼任，並要求南昌各界準備加以歡迎。孫中山便頒布任李烈鈞為江西都督令，李烈鈞乃就任江西新一任都督。在不到一年時間內，江西都督便更換四任之多，可知在政局上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執政方向也有多頭馬車之情況，上從政黨派系，下到社會民眾，全無秩序可言。

## （二）李烈鈞接任都督

李烈鈞接任都督之後，意圖有所作為，乃與江西各方人士開會討論，提出六點改革目標：

- 1.羅致人才。
- 2.選派留學。
- 3.肅清匪患。

<sup>104</sup> 申報 1912 年 1 月 2 日、1912 年 1 月 12 日。

<sup>105</sup> 呂芳上，〈民國初年的江西省議會 1912~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8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 6 月)，頁 223。

<sup>106</sup> 李烈鈞，《李烈鈞自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4。

<sup>107</sup> 〈贛省更舉都督情形〉，《申報》1912 年 3 月 14 日



#### 4.整理財政。

#### 5.修築河堤。

#### 6.裁編軍隊。<sup>108</sup>

上述幾點將其濃縮，可看出李烈鈞施政方面著重以下三方面：其一，整頓吏治、培養人才；先對於之前各司、廳、處組織人選取決於黨部會議之情況進行改善，後讓各省界人士皆可參與江西政權；先對前朝軍政兩界人員大加淘汰。後任命鐘震川為內政司長、魏斯靈為財政司長、王侃為司法司長、胡澤為交通司長、宋育德為教育司長、俞應麓為軍政司長。<sup>109</sup>在行政體制上裁撤前清設置道、府一線機構，廳、州等名稱改為縣，縣級長官通稱為知事，形成省、縣兩級行政架構。<sup>110</sup>全省設 81 縣，各縣知事的選任，由內政司負責，3 人被選，擇優取用。縣級單位設民事、財政、學務、實業、警務、司法等 6 課。<sup>111</sup>培育人才方面歡迎內外人才，設立招賢館招才；並因應清末起盛行之留學風氣，補助經費及負責組織有意前往留學歐美或日本學生。

其二，整理財務、建設江西；江西是一個內陸省份，經濟不很發達，加上辛亥革命後政治經濟混亂之情況，財政早已收支不敷。革命光復之後，經濟情況更糟。江西不到一年內換 4 任都督，人事變動頻繁，不少人乘機貪污掠奪。而由於前文有提及江西有分督分府治理的現象，使各個督分府都將各種款項截為占為己有。地方稅款不至，導致李烈鈞督贛時財政極為困難。為早日擺脫這種困境，李烈鈞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李烈鈞聘請理財人才周馥九、危子遠等人幫助整理財政，在他們的幫助下江西開辦了民國銀行，發行地方紙幣，活躍金融。<sup>112</sup>同時，為統一江西政權，李烈鈞正式下令取消除南昌都督之外的其它四個分都督府。經過這一系列的措施後，江西財政開始好轉，不但能自給還能向中央上交稅款。其次，李烈鈞為活絡江西經濟，極力發展交通運輸。鐵路作為交通的重要方式對

<sup>108</sup> 李烈鈞，《李烈鈞自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5~27。

<sup>109</sup> 李中福、周望高，〈李烈鈞督贛期間的得失探析〉《黨史文苑》，2006 年 02 期，頁 29。

<sup>110</sup> 何友良，《江西通史 11：民國卷》（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6。

<sup>111</sup> 徐輝琪編，《李烈鈞文集》（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21。

<sup>112</sup> 李烈鈞，《李烈鈞自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7。

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江西的鐵路建設卻極為落後。清末籌辦的南潯鐵路費時費錢不少但收效甚微僅夠保本而已，為發展經濟決定借款擴展鐵路並改組南潯鐵路有限公司，為江西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動力。

其三，整備軍隊、清肅匪患；在辛亥革命爆發十年間，江西洪江會曾多次參與反清起義，對推翻清政權做出了一定的貢獻。辛亥革命勝利後，洪江會會眾作為革命的功臣，由秘密活動轉入公開合法狀態，這促進了洪江會的發展，但是也出現了魚龍混雜的情形。面對會黨的迅猛發展，江西軍政府第一任都督吳介璋也試圖予以約束，曾把洪江會徒改編為民團。但是簡單的將會徒改為民團卻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後果。民團迅速擴展之後，政府又無法解決其薪餉開支，只好由民團在各地自籌，民團騷擾地方，自然事所難免，而該會大多以革命功臣自居，目無組織紀律，成了一支誰也控制不了的力量。李烈鈞上任後便將洪江會首要分子捉回南昌，判處死刑，對混在軍隊裡的暗中作亂的洪江會首要分子執行槍決。同時下令對遣散的民團予以合理的安置，江西社會秩序迅速改觀。<sup>113</sup>李烈鈞決定整編軍隊，以編練勁旅和摺節經費為目的，大量裁減兵力和整編部隊，明顯減少財政負擔，並欲以精兵手法提高軍隊數值，將江西軍隊統編為 2 個師，以歐陽武、劉世均為師長，負責訓練工作。<sup>114</sup>

從以上種種作為，看似李烈鈞要開始大展身手，但其實李烈鈞僅屬救火隊的角色，江西政界領導階層很快又有新的更迭。1913 年二次革命爆發，李烈鈞於湖口率軍起事，但旋即被北洋軍擊敗，李氏出亡海外，江西遂落入北洋軍系統治地盤。直至 1926 年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擊敗孫傳芳五省聯軍，收復江西，寧漢分裂下的南國民京政府任命雖以李烈鈞資格老，任命其為江西省主席，但卻引起主攻江西最力的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不滿，所部乃發動事變，擁立朱氏為省主席，並得武漢國民政府的正式委任。爾後雖然寧漢復合，朱培德也入主中央任參謀總長，但江西仍由朱部滇軍老三軍系統治理。直至 1931 年底，為落實所謂「贛人

<sup>113</sup> 李中福、周望高，〈李烈鈞督贛期間的得失探析〉《黨史文苑》，2006 年 02 期，頁 29。

<sup>114</sup> 李烈鈞，《李烈鈞自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7~28。

治贛」，始由熊式輝接任江西省主席。

## 第二節 從軍人至省主席

### 一、初入省府及其施政思想

1931 年 12 月 15 日，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命熊式輝、吳健陶、陳劍脩、龔學遂、熊育錫、文群、熊遂、袁良、李德釗為江西省政府委員，以熊式輝任省主席兼民政廳長，吳、陳、龔分掌財政、教育、建設廳。12 月 17 日，國民黨中央黨部撤銷江西黨政委員會，改組江西省黨部，任命熊式輝、王貫英等 7 人組成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代行省黨部職權，熊氏黨、政大權在握。

1932 年 1 月，熊式輝正式就職，並提出三項就任省主席後優先處理之事務：

一、江西全省僅有 20 餘縣之乾淨土，省府改組，同人等之所以之所以有勇氣前來，全仗著我們三千萬人民在此日應有的一種「自覺」，覺悟到己身與政治是有密切的關係，同來努力，促成政治之上正軌。祇要我們能治，就不怕土匪之作亂。

二、目前最緊要工作，在剿匪。協助剿匪的要點：(一)辦理保衛團：發揮人民本身自衛力量。(二)救濟農村：消滅赤匪造亂的機會。(三)修築公路：便利部隊剿匪的交通。

三、政治方面的要點：(一)積極為民興利，政府當以大多數人民意志為意志，次第推行大多數人民利益所關之事。(二)積極為民除害，政府當負責儘先辦到 1. 「對錢」不容許有假公濟私者之貪汙。2. 「對人」不容許有濫竽充數者之貽誤。3. 「對事」不容許有畫餅充饑者之欺騙。<sup>115</sup>

由此可見，熊式輝上任之初，還是以剿共為重點，並輔以人民自動自發之行為及

---

<sup>115</sup>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119。

用人以不貪、不違反民意為基礎，讓民眾加入剿共行列，並以農村和公路為建設之重點。

1932 年 1 月，熊式輝於省府舉行就職後首次總理紀念週時，便提出「贛人治贛」，並以「贛人治贛的真精神」為題致答詞：

同人承梅監誓員過獎，說是學問道德都不錯，十分惶愧，學問道德是要以事實來表現的。在今日除肅除赤匪之外無學問，除剷除貪汙之外無道德，同人不敢不勉。至言贛人治贛，鄙見以為社要能治，卻不必問其是贛人仰非贛人，真正贛人治贛，亦不必專在少數政府官吏之籍貫上計較，而要喚起江西三千萬人民個個起來自治才是，否則社有省主席及幾位委員是贛人，卻不一定會把贛治好，從來中國是中國人治的要大聲疾呼的叫醒三千萬贛人，群策群力先平匪患，然後才可著手建設一個新江西。這才是贛人治贛的真精神。<sup>116</sup>

由上述可知，熊式輝等上任時，社會上議論紛紛、說法甚多。他針對兩個最流行的議論，在 1932 年 1 月 25 日特別做出回答：一是針對關於新一任省政府 9 個委員學問人格都很好的說法，明確指出這是恭維之詞，學問人格是靠不住的東西，有所謂學問很好的人，做起事來卻比所謂沒有學問的更糟；有所謂人格很好的人，在可好的環境中會好、可壞的環境中會壞，而去年好今年壞的也不少，所以不要太迷信這種東西。他認為，在今日的江西，不是什麼空空洞洞的學問人格，可以就得起來的，我們要以實際工作上去研究，誰把江西土匪肅清了，誰就算是有學問；誰把江西的貪官污吏鏟盡了，誰就算是有人格，除此以外無學問無人格。二是不贊同這一次新省府多是江西人、體現了贛人治贛精神，以後一切政治很有希望的說法，指出治中國的都是中國人，何以中國還是這樣遭呢？可見光是幾個主席、委員，能力有限，要想江西政治有希望，要以江西三千萬人的全力加上去

<sup>116</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121。



才行。如果江西三千萬人民個個對於新江西的建設來努力，就是省政府九位委員，是個人類以外的猴子，江西也會得好；如果江西三千萬人民個個對於新江西的建設不來努力，那末省政府九位委員，就是九個道地的江西寶貝文天祥，也不過為江西做一個忠臣孝子而已，江西仍然不會得好的。因此，新江西的建設，要以三千萬人民一致的努力為基礎，要全體江西人一致努力來治江西的事，三千萬人民自治起，這才是贛人治贛的真精神。<sup>117</sup>這個講話體現了熊式輝的務實精神和清醒頭腦，特別是關於贛人治贛的問題，以 1920 年代初以來長期盛行，以無人對其進行科學性德分析和澄清，對於治政多少有些負面影響。熊式輝的言論，應當說是比較得當的。這也為他爾後實行的大規模社會動員，埋下了伏筆。

熊式輝立即向社會宣揭其治贛方針。在其就職答詞中，他強調江西只有將匪患完全肅清之後，政治上才有辦法，因此他確定其施政方針為一切以達成剿匪任務為基本原則，已動員全省民眾集中力量，協助剿匪為基本任務<sup>118</sup>。在協剿的主題之下，他也發表了關於財政、建設、教育、民政等方面的設想，表示要設立財政委員會，以整治山窮水盡、混亂已達極點的江西財政；在民窮財盡的江西不易談建設，擬先行築路和整理礦產；注意實用之職業教育，培植技術人才；民政事業要靠縣長去做，故要審慎選用縣長。其總的施政精神，是要事均實事求是，絕不鋪張揚勵，亦決不濫發空頭支票欺騙吾贛人民。所以現在決定積極方面，多數人認為應做者，不應做者，即絕對不做；消極方面，首重澄清吏治，造成廉潔政府，已嚴明治省。熊式輝的這些方針，在當時頗得人心。

## 二、行政與體制調整(縣政改革)

熊式輝以調整政府機構體制著手施政，首先變更地方行政制度，在省縣之間建議成立固定的權力機關組織行政區。按中國由於幅員廣大，自秦朝實施郡縣制後，縣已成地方行政基礎，歷代政府為加強地方治理，多在省縣之間設置如道、

<sup>117</sup> 何友良，《江西通史 11：民國卷》(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35。

<sup>118</sup> 何友良，《江西通史 11：民國卷》(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36~237。

州、府等機構，如明清地方行政即為省一府一縣三級制。民國成立後，廢除府、道、州等層級，而為省一縣二級制，省府動輒需統領數十甚至上百個縣，往往增添地方治理上的困難。

1931 年夏，南昌行營黨政委員會為便利對中共江西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乃將圍剿區內的江西 43 縣臨時劃分為 9 個區，每區轄數縣，設黨政委員會分會處理全區一切黨政事務。第三次圍剿失敗後，熊式輝檢討原來的省縣兩級行政體制，認為省縣上下相隔，政令難通，督率不便，行政效率不高，決定依照分區辦法，將南昌行營原在部分地區實行的臨時措施推行全省，在省縣之間時行行政區制度。經過 4 個月的籌劃，1932 年 6 月 2 日，江西省府第 471 次省務會議根據交通、經濟情況及圍剿紅軍的需要，正式通過《江西省各行政區長官公署暫行規程》，將全省 83 縣劃分為 13 個行政區，每區設依行政長官，兼領駐在地縣長，綜理轄區內行政及保安事宜。至此，江西全省高中層行政組織由省縣兩級制改變為省區縣三級制，省政府的行政效率及對全省的掌控能力都能相應得到加強。這在全國也屬創舉。由於成效頗彰，國府決定將江西經驗推行至全國，行政院乃於同年制訂《行政督察專員暫行條例》，作為臨時制度讓有必要設置的省份照此辦理，並令江西省所有各區行政長官應改為行政督察專員，即以現任各該區長官繼續充任專員。

也在 1932 年同一年，熊式輝成立「江西縣政研究會」，專門研究縣政治理。按省政基礎在縣，一縣如何為治，必就今日之環境重新講求，縝密計畫。熊氏認為天下無不可收拾之局，現各縣大部分雖屬殘破，只須分別策定為治方略，一掌之地，亦自無難。當此危疑震撼，人人裹足不前之日，風雨同舟，三分人才亦可以做七分之用，余將此會為研究各縣縣政及選拔人才、儲備人才之所。起衰振弊，撥亂反正，聚眾智以為智，合群力以為力，不坐待奇才異能，只須求同心一德，禮羅多士，相為師友，與舊時各省吏治訓練所等絕不相同。熊式輝曾於縣政研究會提到何謂「治亂相剋」，大要謂：「匪以亂來擾我治安，我當以治去平其亂擾。過去由於我們之不自為治，故匪類得乘間竊發以造亂，不是匪類之厲害。一切匪

亂皆自我們之有政不治而生，社要我們從此警覺，勵精圖治，就不會有匪在能造亂。今日匪勢燎原，固然要賴軍事以致其標，而曲突徒薪，更須政治以治其本。」

119

熊式輝甚為重視縣政治理，視之為其經營江西成敗與否的重要關鍵，曾在縣政研究會多次發表重要演講。如 1932 年 3 月 5 日在縣政研究會講「民」，聞有很多中了共匪傳毒的人，說共產黨最會博取民心，此乃一般殘兵敗將、昏官、庸吏的口吻，必須為之消毒。民眾之所以被裹脅，乃由於共匪威、縱、誘、騙手段之惡辣，威以殺戮，縱以財色，誘以分田，騙以翻身，在我政府都視為無法無天不能做的事，共匪皆優為之。好在今日縱誘騙三項，民眾俱以識破，惟威的一項，無法抵抗，當前急務在於如何喚起人民之敵愾心與組織自衛武力，以解除赤匪之威脅。<sup>120</sup>3 月 9 日，在縣政研究會講「官愿」，原是貌似忠厚，巧文弄法，口說道德，舞弊營私，政之賊也。此種官愿不予根絕，政治永難望其清明。在今日匪亂時期，人人必須重廉恥、尚氣節、不愛錢、不怕死。抗起鐵的肩骨，擔當自己責任，「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然後人心才會振奮起來。<sup>121</sup>1933 年 8 月 6 日，在縣政研究會講「貪污與竊、盜、訛、騙、乞人格之比較」，指出剛的力奪是強盜，柔的巧取是訛索，是騙子，是乞丐，同一無恥。其中有老弱殘疾之如乞丐者還可原諒，官吏之貪汙無恥之人格與竊盜訛騙乞者無以異，而官吏之貪汙比乞丐猶有不及，官吏並非有因老弱殘疾而使貪污，故無可原諒，只有嚴懲。<sup>122</sup>同年 8 月 31 日，在縣政研究會講「江西復興人才」，說道江西復興必先清匪，能夠清匪就是人才。匪者非也。士、農、工、商、兵不務正業，為非作歹，所以成為民匪。但是政府官吏，不守本職，犯法亂紀，也應視為官匪，必先有官匪然後才會產生民匪，我們想剿清民匪，使士者士，農者農，工者工，商者商，兵者兵，便

<sup>119</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128~129。

<sup>120</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133

<sup>121</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134

<sup>122</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137

先要繳清官匪，必使官是官，吏是吏，人人能盡職責，事事皆守法紀。<sup>123</sup>

由於熊式輝甚為重視縣政治理，不但多方講求治理方法，並積極培育、拔擢專員、縣長人才，遂能發揮「以臂使指」的功用，並具體表現在其省政經營上。



---

<sup>123</sup>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 137



## 第四章 贛政建設

### 第一節 省政經營

熊式輝自 1931 年 12 月出任江西省主席，迄 1942 年離職，在任時間長達十年，這在當日中央控制省份中是極為少見的。而在此「贛政十年」中，其施政大約可分為三期：

#### 一、剿共時期（1932-1934）

熊式輝上任之初，正值江西蘇區共患猖獗。由於長年內政不修，吏治不振，省縣之間，上下遙隔，稟承督率，兩俱難周，遂首創行政區制，斟酌交通、經濟及匪情輕重，將全省劃為若干行政區，區設長官，兼任駐在地縣長，並指揮監督所轄區內各縣行政及保安事宜。繼而鑑於交通之不便，乃廣修公路，遍設電話，並厲行保甲制，組織協剿會，編練保安團，建立碉堡。於是中共蘇區勢力蹙處一隅，終於潰走。此後他省剿共，亦莫不效法江西所創立的各種制度。<sup>124</sup>

#### 二、建設時期（1935-1937）

1934 年圍剿成功，匪亂既平，熊式輝乃於 1935 年開始銳意建設，並仍以行政督察制度為推行新政之動力。同時建立區、鄉、鎮制，以完全地方行政與自治機構；多設鄉村師範學校及保學，以啟民智；創建農學院，興修水利，設立合作社，以裕民財；設衛生處，縣區衛生院，以救民疾；設婦女指導處，以訓迪婦女；舉辦航空測量與土地呈報，以促地政；修築浙贛鐵路，以利交通。同時配合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開始進行重工業建設，整理鎢、錫、煤礦，創辦各種工廠，以增加國家與地方之富源。<sup>125</sup>

#### 三、抗戰時期（1937-1942）

及至 1937 年抗戰發生，江西以一省供應三個戰區之需要，負擔頗重。熊式

<sup>124</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2。

<sup>125</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2-3。

會乃動員全省軍民，接濟軍糈，設立設訓隊，舉辦兵役，調整游擊戰區縣內行政組織，複查戶口，管理榮譽軍人，救濟難民，建設江防湖防工程，開墾荒地，增產糧食。凡此種種舉措，綱舉目張，巨細靡遺。此外，復秉承抗戰建國精神，積極籌設興業公司，以建立贛省工業基礎，舉凡鋼鐵、水泥、麻織、機械各工廠，先後林立，既以濟一時之急，復以奠百世之基，對於國力民生裨益甚多。<sup>126</sup>

至於熊式輝經營省政的具體內容，則可分述如下

## 1. 推行保甲

1931 年夏，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設立黨政委員會，指定江西省 43 縣為剿共區域，為嚴密民眾組織，增強自衛力量，將各地原有區鄉鎮閭鄰等自治組織一律停辦，另頒保甲條例改編保甲，是為江西推行保甲制度之開始。熊式輝蒞任以後，仍將保甲制度積極推行於全省，規定進度，限期完成，結至 1934 年 12 月止，舉辦完竣者實得 62 縣，其後復經整理，遵照行營頒發整理保甲方案，將全省劃分為清鄉、保衛、保甲三種區域，連鎖辦理，使其組織更趨嚴密，訓練更加普遍，運用更加緊張。至 24 年 12 月，統計全省 83 縣及南昌、九江兩市共有 461 區，2648 保聯，25584 保，269066 甲，全省民眾組織完成，不但匪徒不敢再啟覬覦之心，且由自衛的組織進而為自治的組織，由治標的制度進而為治本的制度，均以此為初基。<sup>127</sup>

## 2. 組織保衛團

保衛團是地方自衛的武力，過去各自為政，編制紛亂，主席宣誓就職答詞首先即提到辦理保衛團發揮人民自衛力量，故自 21 年起逐步改編整理，22 年南昌行營頒發整理江西保衛團計畫綱要，由保安處遵照實施，核定每中隊人槍數額，計成立團部 63，中隊 268，直屬分隊 12，此外有保衛師 3 師，區保衛團 3 團又 4 中隊，編制名稱，均趨劃一，經費方面，一由區自為政而歸於縣統十，在指揮上

<sup>126</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3。

<sup>127</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4。

由區域自守而集結活用，防剿力量，逐漸發揮。23 年 7 月復進一步之整理，將各縣即特別區政治局保衛團，一律改為區保安團及保安隊，同時撤銷保衛師，歸還原編制，所有各區縣團隊官佐，統由保安處核委，經費亦由保安處統籌支，至人事經理，均統一於省。同年 12 月再將各區現保安團隊，改編為甲乙兩種保安團，共 28 個團，直隸於保安處，完全達到統一於省之目的，對內可負綏靖地方之任務，對外足以為國軍改進之基礎。<sup>128</sup>

### 3. 修築堡壘

江西股匪猖獗，雖經大軍痛予撻伐，然此剿彼竄，防不勝防，故厲行建築碉堡以加強據點，此類碉堡，有護路堡，橋頭堡，城防堡，村落堡及碉堡線，碉堡建築有軍築有民築，軍築者由國軍或保安團隊在進剿地區區域建築，民築者則由各地民眾在征工征料之原則下構築，碉堡之守護，重要者由駐軍團隊擔任，普通者由地方義勇隊守護，截至 1935 年 12 月止全省共完成，堡 14000 餘座。自厲行堡壘政策以來，股匪到處碰壁，無法立足，其在剿匪軍事上，為效至密。<sup>129</sup>

### 4. 修建公路

熊式輝在宣誓就職答詞中，提出協助剿共必要辦法的第三件就是修築公路，熊氏在演講中說：「以前剿匪工作，在軍事方面往往因為交通阻塞，感著許多困難，以後我們為便利軍事上的動作計，對於公路的修築，是刻不容緩的，而且公路修築成功，在目前固然便利於剿匪軍事，亦即為將來發展本省交通和經濟的基礎」。根據此一「交通清匪政策」，1932 年以後公路的修築，即隨軍事而進展，歷年完成里數，1932 年為 1022 公里，1933 年為 932 公里，1934 年為 2332 公里，較之以前每年至多完成 100 餘公里，實有突飛猛進之勢。惟剿共時期趕築之路，工事不免簡陋，橋梁及路基路面等，後來歷經改善，以應交通之需要。又本省築路，完全是動員民眾來工作，故成功速而費用省，平均每公里只花費 1100 餘元，

<sup>128</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4-5。

<sup>129</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5。

而他省則平均每公里有費至 7000 餘元者。<sup>130</sup>

## 5. 架設電話

江西剿共時期，為便利軍訊，特注重長途電話之建設，惟因經費關係，由各行政區各縣各區自行籌設，大抵專員公署與所轄各縣政府，縣政府與各區署，區署與各保聯辦公室之間，多能直接通話，據建設處統計，全省之縣辦電話線路長 2047 餘公里，惟各縣分別架設，未能全省貫通，故通訊效力稍受限制。此外，隨公路而發展之公路電話，亦分佈甚廣，連同接收之軍用電話，線路長度亦達 3700 餘公里。<sup>131</sup>

## 6. 救濟農村

熊式輝在就職答詞中，曾指出救濟農村是協剿工作的必要辦法之一，故省政府特將農村合作列為復興江西要政之一，於 1932 年 3 月設立江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主管全省合作行政，是為省社合作行政機構之始，當時主要工作為督導收復區農民組織合作預備，辦理救濟貸款，並在普通縣份組織信用合作社，此外利用合作社運銷合作亦逐漸試辦，截至 1934 年底，全省已有各種合作社 1066，社員 34599 人，社股 39234 股，社股金額 106073 元，放出貸款 1140862 元，1935 年以後，合作業務進展更達，對於發展國民經濟時有莫大之效力。<sup>132</sup>

## 7. 衛生事業

本省自經匪患，災焚之餘，疾病流行，醫藥衛生，迫切需要，乃創設全省衛生處，主管本省衛生行政，促進公共衛生事業，於 23 年 6 月正式成立，並設省立醫院，衛生試驗所，南昌市衛生事務所等附屬機關，又督導各縣設立醫院或診療所(其後改為縣衛生院)對收復匪區則組織救護醫療組赴各地以資救護，此外復由衛生廳教育廳合組健康教育委員會，辦理學後衛生及診療事宜，均頗著成效。

<sup>130</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5。

<sup>131</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5-6。

<sup>132</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6。



以前衛生行政是民政廳工作之一部分，省有獨立的衛生行政機關，當自本省開始。

133

## 8. 土地整理

本省土地久未整理，經界紊亂，地籍散佚，不獨地方財政，蒙其損害，且使農村經濟亦受影響，故整理土地，實為迫不容緩之圖，省政府經縝密之考慮，認為採用航空測量，需時較短，用費亦省，乃請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組織航空測量分隊，來省專任其事，於 21 年 8 月先就南昌縣試辦，而由土地局(今改地政局)辦理調查、計積、製圖、造冊、登記各項業務，23 年 1 月南昌土地航測完竣，成績良好，乃訂定全省土地整理計畫，自 23 年 7 月開始將 82 縣劃分為五區，分作 5 期整理，預計 8 年完成，及抗戰軍興，停止航測業務，改用人工測量、繼續整理，計土地測量已完竣縣份有南昌等 17 縣，以實行地價稅者，有南昌等 9 縣。採用航空測量以整理土地，亦為本省創舉，熊主席對本省參議會總報告曾說：「航測有 3 大作用：1 可完成宅地圖，以為各縣征收宅地稅之根據 2 可完成田畝圖，以為整理田賦之根據 3 可完成地形圖，以為繪製軍用地圖的張本。故航空測量卻是建國中最急最要的工作。」<sup>134</sup>

## 9. 設立農業院

本省土地久未整理，經界紊亂，地籍散佚，不獨地方財政，蒙其損害，且使農村經濟亦受影響，故整理土地，實為迫不容緩之圖，省政府經縝密之考慮，認為採用航空測量，需時較短，用費亦省，乃請參謀本部陸地測量總局，組織航空測量分隊，來省專任其事，於 21 年 8 月先就南昌縣試辦，而由土地局(今改地政局)辦理調查、計積、製圖、造冊、登記各項業務，23 年 1 月南昌土地航測完竣，成績良好，乃訂定全省土地整理計畫，自 23 年 7 月開始，將 82 縣劃分為五區，分作 5 期整理，預計 8 年完成，及抗戰軍興，停止航測業務，改用人工測量、繼

<sup>133</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6。

<sup>134</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6。

續整理，計土地測量已完竣縣份有南昌等 17 縣，以實行地價稅者，有南昌等 9 縣。採用航空測量以整理土地，亦為本省創舉，熊主席對本省參議會總報告曾說：「航測有 3 大作用：1 可完成宅地圖，以為各縣征收宅地稅之根據 2 可完成田畝圖，以為整理田賦之根據 3 可完成地形圖，以為繪製軍用地圖的張本。故航空測量卻是建國中最急最要的工作。」<sup>135</sup>

## 10. 創設行政區

20 年夏，前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將本省剿匪區域 43 縣劃分為 9 區，每區設黨政委員分會，負責處理轄縣一切黨政事宜，是即行政督察專員制之濫觴，黨政委員會結束後，本省鑒於匪患時期，省縣間上下遠隔，秉承督率，兩俱難周，遂於 21 年 2 月仿區黨政分會辦法，首創行政區制度，斟酌交通經濟及匪情輕重，將全省劃分為 13 個行政區，各設長官兼任駐在地縣長，指揮監督轄內各縣行政及保安事宜，俾躬行振導，已轉移政治風氣，而形成澄清吏治剷除匪患之契機，是年 8 月奉行政院頒發行政督察專員暫行條例，即改行政長官為行政督察專員，匪患肅清後，將 13 行政區改為 8 區，抗戰時期為適應游擊戰區情況，復分別增設改劃，現為 11 區。<sup>136</sup>

以上所列舉者，只是熊式輝經營省政之大端者，其細項則不及羅列。至於協同剿共、參與抗戰及建設教育等事項，則將在下文續予探討。

## 第二節 協同剿共

1930 年至 1934 年，國民政府動員大量兵馬，對江西蘇區進行五次圍剿。<sup>137</sup>在此約四年時間中，第一次及第二次剿共其實並不成功，而熊式輝在就任江西省主席時，江西省半數以上的縣份已被中共控制，紅軍也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

<sup>135</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6-7。

<sup>136</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7。

<sup>137</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 116。

並在第三次反圍剿中於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紅軍勢力進展甚速。1932年初熊式輝上任後，在軍事上實行「圍剿」總動員，改編地方武裝為15個保安團，並推行「三保」政策(保甲制度、保衛團制度、堡壘政策)，成效十分不錯，並有效嚇止中共根據地的拓展與鞏固。<sup>138</sup>

最終，國民黨取得第五次圍剿的勝利，逼迫紅軍離開江西並進行長征，而在一般研究中大多提及中共方面的失誤，很少談到國民黨成功及逆轉之道，以及熊式輝的剿共戰略、戰術，這是本文試圖理解的一大重點。

而蔣中正的態度，也是剿共的一大重點。自從1932年蔣中正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復職再起，尤其是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剿共」成為蔣的主要戰略中心。除了集結中央軍主力、調整剿共方略外，蔣中正極力拉攏與紅軍活躍區域地緣相近的兩粵參與圍剿。身處江西剿共前線的熊式輝，就曾最早提出與粵方建立合作關係的建議，並謂「以防共匪並長江交通如不能自由，最近將來贛省鹽荒必甚，而赤匪或亦乘機益擾，故贛粵兩省軍事與交通應從速聯絡一氣，以期互助。」<sup>139</sup>可見熊式輝十分清楚蔣圍剿江西蘇區的意圖。

熊式輝在圍剿後期(1933—1934)，以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室主任的身分，承擔與共產黨正面作戰的任務，在軍事方面採用碉堡封鎖，在政治方面則動員民眾，皆取得重要的成效。南昌行營係在江西剿共戰事中成立，秉持剿共「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中心思想，<sup>140</sup>南昌行營和旗下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曾設計推行一些計畫，如新生活運動、中國文化學會以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等；<sup>141</sup>這些計畫在協助進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上，都發揮了一定的成果。<sup>142</sup>

因第一、二次剿共失敗，熊式輝才有機會回到故鄉江西主政，這便顯示出第一、二次剿共戰爭之重要性，並可從其缺失進行檢視，方能了解爾後剿共成功之

<sup>138</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 明鏡出版社，2008)，頁27。

<sup>139</sup> 《熊式輝致蔣中正電》(1932年2月1日)，《事略稿本》，第13冊，第122頁。

<sup>140</sup>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25刊輯；《軍事委員長行營政治工作報告(民國24年)》(台北: 文海出版)，頁1。

<sup>141</sup> 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收入《走向近代：國史發展和區域動向》(台北: 東華書局，2004)，頁336~337。

<sup>142</sup> 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頁345。

原因。

### (一)第一次剿共

1930 年 11 月，蔣中正從南京來到南昌，召開剿匪軍事會議，開始部署第一次圍剿作戰。同年 12 月，南京國民政府調集 10 萬大軍和航空隊以南昌為總司令部開始了對江西共軍的第一次圍剿作戰。而國軍參戰部隊有第六路軍、第九路軍、第十九路軍、共十一個師及三個旅，兵力約十四萬人<sup>143</sup>。

當時正逢中原大戰告終，國民政府乃集中兵力，對共產黨發動圍剿戰爭。南京國民政府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九路軍司令魯滌平出任圍剿軍總司令，張輝瓚任總指揮，集中向位於贛南的中央蘇區發起進攻，中共方面主要由紅一方面軍應戰，此時紅一方面軍下轄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當時，中共紅軍以朱德為總司令，共有 4 萬餘人。<sup>144</sup>12 月 20 日，戰爭開打，國軍先向東固推進，並展開東固戰役，此役國軍雖勝，但被其打敗的並非紅軍主力。紅軍方面則開始採用毛澤東、朱德的誘敵深入戰略，並以各個擊破之計，於 12 月 30 日在龍崗實施中間突破，殲滅國軍近萬人，取得龍崗戰役的勝利。隨後，國軍各部紛紛退卻，紅軍趁機揮戈東向，於 1931 年 1 月 3 日在東韶突襲立足未穩的國軍，取得東韶戰役的勝利，俘虜國軍官兵三千餘人，其他餘部則向南豐方向潰逃。<sup>145</sup>

在第一次江西剿共戰爭中，紅軍在半個月的時間里，經東固、龍崗和東韶三次戰役，斃傷國軍 1.5 萬餘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其根據地也得到了鞏固和擴大。而這次剿共特別的一點是，國軍軍政部航空署所轄的第一、三、五航空隊曾派往江西進行支援任務，在龍岡戰役時大舉轟炸敵軍，其戰績雖受天氣影響，但在通信聯絡、空投補給及偵查方面，都有一定的效果。<sup>146</sup>

<sup>143</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 117。

<sup>144</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 117。

<sup>145</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 140~147。

<sup>146</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 149。



第一次圍剿失敗原因，大多認為中共「誘敵深入」戰略成功，且由於中共「堅壁清野」，使得國軍無法獲得補給和情報。<sup>147</sup>然而，熊式輝則認為失敗原因為：

第一次圍剿失利，主要原因在於低估匪之力量過低。當時南北各軍閥呼號叛變，我國軍由能次第蕩平，以為湘鄂贛閩之伏莽，不然乘勝剿滅，乃就變指定鄂贛部隊，畫區分剿。其實在中原討逆軍事初結束，長江精銳之師，大半被調參加作戰，戰後皆有待於補充整訓，而留在後方部隊，比較脆弱，共匪蓋已早窺其隱，故感大膽流竄，以竊長沙，覬覦南昌之猖獗，江西以為匪巢穴，未被重視，竟平列湘鄂贛三省八個剿匪區之一，初由武漢行營何主任成濬處理，後由南昌行營魯兼任滌平指揮……應從新部屬，而為第二次圍剿之規劃。<sup>148</sup>

言下之意其實著重於此次作戰部隊大多為非嫡系部隊，且太過忽略共黨在江西的布局，中原大戰之後國軍尚未獲得充裕的休息，並認為應將江西剿共事務獨立出來。

## (二)第二次剿共

1931年2月，南京政府開始部署第二次剿共行動，何應欽出任南昌行營主任，共調集國軍20萬人。而國軍參戰部隊除了第一次圍剿的第六、第九、第十九路軍之外；還多增加了第五和第二十六軍，共約二十個師又四個獨立旅，兵力約二十萬人<sup>149</sup>，4月1日開始，國軍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分五路向紅軍根據地推進。

紅軍方面則為第一軍團之第三、第四、第十二軍；第三軍團之第一、第三、第四、

<sup>147</sup>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152~154。

<sup>148</sup>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111~112。

<sup>149</sup>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117。

第六師，另第三十五軍，共約六萬六千人左右。<sup>150</sup>紅軍繼續採取堅壁清野、誘敵深入的戰術，於4月23日進軍至東固、龍崗地區隱蔽集結。5月16日，紅軍在東固殲滅來犯國軍，隨後向東橫掃700里，連續進行了白沙、中村、廣昌和建寧四次戰役，消滅國軍3萬餘人，至5月31日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sup>151</sup>

一般認為，第二次圍剿失敗原因有：部隊之間聯絡溝通不足、部隊執行能力低下，以及情報的收集不足等。<sup>152</sup>而熊式輝則認為：

第二次圍剿，乃由何軍政部長敬之兼行營主任，負責指揮，自較第一次圍剿部屬更為鄭重，同時運用黨政力量齊頭並進，計畫亦更周到，方位按日計程，如期可奏膚功，乃其間中央人士分裂偽國民政府成立於廣東，邊地告警頻仍，軍閥又混戰川北，全國糧食，以贛湘為倉庫。而江西匪亂未停，湖南水災奇重，直接間接影響剿匪軍事甚鉅……乃不得由總司令之親臨督剿。<sup>153</sup>

由上文可知，熊式輝認為二次圍剿時，川北軍閥混戰及廣東反蔣派政府成立，均對圍剿戰事影響甚鉅。

大體而言，這兩次的剿共都以失敗收場，在〈曾愚函轉蔣中正上次東固剿共慘敗情形〉（1931年5月20日），可窺知其失敗原因一二：

曾愚報告吉安由鄂翼先生轉達

報告上次東固剿匪慘敗情形由

一、王金鈺之基本部隊第十三、第十七、第五十師每次故意延緩不根前進，二十八師兼成突進將領部均作壁上觀。

<sup>150</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158。

<sup>151</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166~175。

<sup>152</sup>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176~178。

<sup>153</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113。

二、這次損失計兵站第三、十七師一旅之眾，二十八師全部。

三、吉安人心惶惶、中級軍官以上之家眷均以送回南昌，窺主義於必要時或將放棄吉安。<sup>154</sup>

從曾愚報告也可以看出，國軍在軍事協調性方面還是不夠，而且部隊奮勇殺敵程度也是不及格的。

早在 1926 年 10 月，熊式輝便對蔣提出「進取江西的策略」，<sup>155</sup>並策反賴世璜江西第四師起義來歸。一般認為，當時蔣中正不先取武漢而先西進江西的戰略是錯誤的，但東南是蔣中正的發跡地，加以蔣看不慣李宗仁、唐生智等地方軍閥在攻克兩湖後恃功而驕，又在俄國顧問加倫將軍的影響之下，蔣乃決定西進江西。<sup>156</sup>熊式輝能理解蔣中正捨去武漢而西進江西的戰略意圖，成功策反江西賴世璜所部，將其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 14 軍，並攻下贛州，且最後收復南昌，這是熊式輝從非蔣嫡系脫穎而出的一個轉捩點，也讓熊氏成為蔣中正身邊重要的親信和幕僚。<sup>157</sup>

1931 年 7 月，蔣中正到南昌，熊式輝率領第 5 師人馬迎接。同年 12 月，蔣下令免去魯滌平江西省主席職務，12 月 15 日政治會議通過由熊式輝等九人改組江西省政府，熊氏則奉委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室主任。<sup>158</sup>而第三次圍剿也隨即展開。

### (三)第三次剿共

熊式輝在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之職時，最重要的政事便是下列三項：

(一)江西全省僅有二十餘縣之乾淨土……，全仗著我們千萬人民在此日應有一種「覺醒」；……促成政治上正軌。只要我們能治，就不怕土匪之作

<sup>154</sup> <曾愚函轉蔣中正上次東固剿共慘敗情形>(民國 20 年 5 月 20 日) 國史館審編處編，《蔣中正總統文獻：革命文獻(三)剿共與西安事變》(台北：國史館出版，2002)，頁 58。

<sup>155</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 101。

<sup>156</sup> 汪榮祖、李敖，《蔣中正評傳》(台灣：商周出版社，1995)，頁 181~182。

<sup>157</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 24。

<sup>158</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 118。

亂。

(二) 目前最緊要的工作，在剿匪。協助剿匪要點：1 辦理保衛團，發揮人民本身自衛力量 2 救濟農村，消滅赤匪造亂的機會 3 建築公路，便利部隊剿匪之交通。

(三) 政治方面要點：1. 積極為民興利，政府當以大多數人民意志為意志，次第推行大多數人民利益所關之事；2. 積極為民除害，政府當負責儘先辦到。

顯見熊氏就職後，最重要的事務就是配合剿共。當此之際，紅軍於 1932 年 1 月攻入贛州，成立蘇維埃政府，闢建「江西蘇區」，聲勢大漲。<sup>159</sup>而進剿軍則剿共物資及財政均告不足，中央政府改組的局面也難以收拾，蔣中正乃憤而下野。熊式輝在此財政不佳的狀況之下，只能積極與財政部及宋子文部長交涉，要取經費以因應剿共軍費及省政需求。

1932 年蔣中正回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意識到無法依靠地方派系武裝消滅共產黨部隊，加之各地勢力反對中央政府的敵對行動漸漸平息，南京國民政府開始抽調最精銳的嫡系部隊開赴剿共戰場，並由蔣中正親任南昌行營主任。1931 年 6 月 21 日，蔣介石親赴南昌主持部署第三次圍剿，以何應欽為剿匪前敵總司令。這一次，南京方面集中了 30 萬兵力，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被調至江西。鑒於前兩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國軍這一次採取長驅直入的戰術，意圖先擊敗紅軍主力，搗毀根據地，然後再深入清剿。7 月 1 日，國軍開始大舉進犯閩西紅軍，紅軍因兵力單薄且缺乏補充和休整而開始向贛南興國地區轉移，以圖集中兵力殲敵。7 月底，紅軍主力成功轉移到興國地區，蔣介石得知後即下令國軍大舉推進，形成了對紅軍的包圍之勢。在此情勢下，紅軍本打算避敵主力突破富田，穿插到國軍後方，但在向富田開進之時被國軍發覺，是以改為從國軍中間突破，進攻蓮塘。紅軍先是在蓮塘之戰中取勝，然後又在良村戰鬥中克敵，到 8 月 11 日於黃陂之

<sup>159</sup>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 明鏡出版社, 2008), 頁 119



戰擊潰國軍後，已經是三戰三捷。8月9日，國軍發現紅軍主力所在，立刻向西、南調動部隊，擺出了密集包圍的姿態。紅軍聲東擊西，派出一隊人馬偽裝主力，吸引國軍，而真正的主力則於8月18日在國軍結合部偷越，回到興國隱蔽休整。8月底，蔣介石發現紅軍主力已經西去，本打算調兵追擊與紅軍決戰<sup>160</sup>。

但此時，國民黨內反蔣派在廣州組建的國民政府卻乘蔣中正剿共之機發兵北上討蔣，引發寧粵戰爭，先鋒已逼抵湖南。無奈之下，蔣中正只好下令撤兵，將軍隊移至湘粵邊境駐防，紅軍趁機反攻，於9月7日和15日兩敗國軍。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府不得不增兵華北，第三次剿共遂於9月21日結束，紅軍則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sup>161</sup>

失敗原因一般而言為爆發九一八事變，總指揮蔣中正乃返回南京坐鎮，且因唐生智聯合桂系、陳濟棠、石友三等人，擁戴汪精衛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並向衡陽進軍，使國軍被逼中途撤離，被紅軍追擊。

#### (四)第四次剿共

第四次圍剿，深感政治力量之重要，決定政治與軍事並用之剿匪指導方針，自省政府以至縣、區、鄉、鎮、保、甲，皆全力發動民眾以協剿。並於各部隊軍官及黨政工作人員，加以剿匪之精神與技術訓練，同時對於匪區實施嚴格經濟封鎖，使匪區之糧食油鹽亦完全斷絕，是故匪勢日蹙，已不可能再負隅自固，但我鑑於前三次圍剿之痛苦教訓，每當剿匪愈接近成功之會，內外之突變亦多，今茲勝利在望，乃不得不為未雨綢繆之地，乃綿密而重訂第五次圍剿計畫。<sup>162</sup>

#### (五)第五次剿共

<sup>160</sup>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上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190~197。

<sup>161</sup>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135

<sup>162</sup>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頁151

第五次圍剿吸取先前失敗的經驗與教訓，以政略配合戰略，廣築碉堡線，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不冒進，不貪功。熊式輝有下列評述：

第五次圍剿期間雖亦內有閩變，外有邊患，尤其是閩中蔣蔡勾結朱毛所造成我側背直接之威脅特甚。幸已早有綢繆，討逆之師東移，偽人民政府即亦瓦解。此時在贛國軍之剿匪環境更為單純，乃得以全力而對匪，匪勢亦因之日蹙。惟匪盤據贛南有內線作戰之便利，出入林谷，運用游擊之慣技，可能隨在豕突、四處鼠竄，我剿匪部隊深入山地以追窮寇，自須先為不可勝，穩紮穩打，逐漸縮小包圍，以期一鼓聚殲之效，於是此次剿匪之指導要領，與其前各次不同。<sup>163</sup>

此外，南昌行營在此次圍剿也發揮相當的功能。南昌行營可說是為了剿共而設立，因為前幾次的剿共並不成功，所以於 1932 年在南昌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並在行營編制內設置了一個侍從室，調行營第一廳中將副廳長晏道剛任侍從室主任。晏道剛也是個久歷戎行的高級軍官，當過唐生智的第八軍參謀長、第四方面軍參謀長。他當上侍從室主任後，在蔣介石身邊參贊軍機，深受信用，權傾一時。<sup>164</sup>南昌行營係秉持剿共「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中心思想，由楊永泰擔任秘書長，熊式輝則任參謀長。<sup>165</sup>其下設立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在楊永泰主持下，曾設計推行一些計畫，如新生活運動、中國文化學會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等；<sup>166</sup>這些計畫在協助進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上，都發揮了一定的成果，對於第五次剿共勝利居功厥偉。<sup>167</sup>茲分述如下：

<sup>163</sup>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 明鏡出版社，2008)，頁 158

<sup>164</sup> 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收入《走向近代：國史發展和區域動向》(台北: 東華書局，2004)，頁 329。

<sup>165</sup>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25 刊輯；《軍事委員長行營政治工作報告(民國 24 年)》(台北: 文海出版)，頁 1。

<sup>166</sup> 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收入《走向近代：國史發展和區域動向》(台北: 東華書局，2004)，頁 336~337。

<sup>167</sup> 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頁 345。

### （一）新生活運動

1934 年，國民政府在蔣中正與宋美齡夫婦的主導下開始推行「新生活運動」。1934 年 2 月 19 日，蔣中正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週上發表了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為歷時十五年的新生活運動（簡稱「新運」）揭開了序幕，這一天也被定為新生活紀念日。此後，國民政府在全國推出這一公民教育運動，該運動最後因民國政府於 1949 年內戰失利而暫停。1960 年代，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運的延續。

面對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局，新生活運動是一場積極的民族復興運動，體現出當時仁人志士不屈不饒為國家、民族分憂的情懷。簡單的講，「就是要使全國國民軍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一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道德標準，來統一人們的思想，這就是蔣中正開展新生活運動的初衷。

同年 2 月 21 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23 日，蔣中正在南昌再次講演，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作了詳盡說明，主張以中國固有的道德「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從改造國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具體標準，以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改造社會、復興國家。

其後，蔣中正多次演講，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力行新生活運動》等演說，並被編成《言論集》廣為印發，希望把「新生活運動」推向全國。

### （二）中國文化學會

中國文化會是在新生活運動之後，設計出來的一項文化復興運動，中國文化學會相應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把人的注意力轉移到大眾共同利益的方法來「更新生活」。這種努力的關鍵是一個「軍事化」項目，它原先只針對復興社成員，後來通過新生活運動促進協會的運作擴展到了一般公眾。正是這個協會採取了許多

極有爭議、強加於人的運動措施，如限制吸煙、跳舞和穿某些西化的衣服。藍衣社後來遭到外國人尤其是美國傳教士們的指責，說他們顛倒了新文化運動最初的宗旨，而把它變成了一場法西斯統治的運動。<sup>168</sup>

中國文化學會名義上由蔣介石主持，但它的日常領導是鄧文儀、蕭作霖、賀衷寒和吳壽彭。鄧是理事長，而蕭當了南昌總部的秘書長。與此同時，決定讓蕭作霖去上海，在劉炳黎（《前途》的編輯）、倪文亞和其他藍衣分子的幫助下建立該學會的一個分會。<sup>169</sup>

### （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1936年1月1日，蔣介石在中央電台元旦演說辭中，闡述了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之後，又強調了「大家務必從今天開始特別努力來做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並說明了兩種運動的相互關係。6月3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章頒佈。這場經濟建設運動的作用已不僅是發展了國民經濟，增加了國民收入，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場戰前的經濟動員運動。這場經濟建設運動，是一場由政府號召並組織的、動員各界人士參加的群眾性的經濟建設運動。因此，它是一場較為全面、較為徹底的經濟建設運動。對中國近代化有著深遠影響。這一切符合中華民族利益和人民願望。<sup>170</sup>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內容共有八條：（一）提倡征工。即動員老百姓做義務勞動。凡築路治河，修整堤壩，培植森林，開闢疆地，均以征工制度行之。（二）振興農業。包括增加農產，活潑農村金融，流暢農產運銷，推行農村合作，以達糧食自給併力求增加工業原料等內容。（三）鼓勵墾牧。一切公私荒地要儘量開墾，對地廣人稀之處，要實行大規模的移民屯墾，經營畜牧，並實行屯田制，以實現地盡其利。（四）調節消費。在積極方面，以最大之努力，儘量節約消費，

<sup>168</sup>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收入《走向近代：國史發展和區域動向》（台北：東華書局，2004），頁343。

<sup>169</sup>魏斐德著，《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sup>170</sup>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收入《走向近代：國史發展和區域動向》（台北：東華書局，2004），頁344。



調劑供求。(五)振興工業。對農產品加工，提倡就農村或其附近發展，對一般工業應由政府實行保護和獎勵的政策，對於那些地方上無力舉辦的大工業，應由政府、企業家一致進行。(六)開發礦產。政府應採取積極的保護及獎勵政策，調查各地礦產，改進採掘方法，禁止地方政府與任何特殊勢力把持礦產，與民爭利。並歡迎外國投資。(七)流暢貨運。一方面儘量發展全國各處的道路交通，改進水陸貨運的辦法。同時又在各地設立主要農作物的公共倉庫和運輸機關，以便屯積和轉運。(八)調節金融。鼓勵儲蓄、活潑資金之融通，設置完備之農村借貸制度，並要全國人民絕對贊助國家關於貨幣匯兌之政策。<sup>171</sup>

國共鬥爭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對抗，更是兩種不同生活型態的抉擇。透過上述這些計畫及建設的推動，國府在江西營造一種符合民生主義開發利源、藏富於民的經濟型態，並主要由熊式輝指揮江西省政府負責執行，對於國家邁向現代化意義深遠。

### 第三節 共赴國難

自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發生，中國為爭取民族生存，國家獨立，展開神聖的抗戰。江西為東南重要省區，自應發動全省的人力物力以付抗戰需要。平時的政治設施，到了戰時，不足應付非常，就必須拿戰鬥的精神，來推進改造，例如平時的地方行政還不夠緊張，就革新基層行政機構，使之發揮戰時效能，平時的民眾組織還不夠健全，就加緊組訓民眾，來發動全民參加抗戰。平時的物資還未能夠盡量利用，就加緊經濟建設，使散漫的生產事業適於戰時體制。平時一般人的精神，還不夠緊張，就擴大宣傳教育，來提高人民抗戰情緒。總之，凡平時所未及改進的缺點，抗戰一經開始，本省就積極加以改進，孫子有言：「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本省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努力充實，以配合軍事力

<sup>171</sup>秦孝儀，《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序》（台北），卷五，中國經濟學說，附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頁41~43。

量，爭取抗戰勝利，就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熊式輝於 1940 年元旦獻辭稱：「壯大自己，就是削弱敵人，穩住自己，就是打到敵人。」這就是抗戰以來江西的政治總動向。<sup>172</sup>

抗戰軍興以後，熊式輝為策動江西全省人力、財力、物力，以加強抗戰力量起見，曾於 1937 年 11 月集合全省黨政軍學各界領袖及士紳，舉行全省抗敵總動員會議，以激勵民氣，團結群力，集思廣益，用濟時艱。當經制定人力動員、物力動員、精神動員三方案。關於人力動員，如兵源補充，工事建築，交通維護，防空協助，難民救濟，傷兵收治，婦女動員等事項；關於物力動員，如募集公債，增加生產，節制消費，暢通金融，便利運輸，調整財政等事項；關於精神動員，如抗戰宣傳方案等，均有詳細的規定，為抗戰初期江西省一切工作的準則。<sup>173</sup>

1938 年 3 月，熊式輝以戰時江西政治應有更積極的設施，以適應抗戰的需要，特訂定《施政綱要》76 條(後經增訂為 82 條)，而歸納於八大綱領之下。此八大綱領為：(1)加強抗戰力量；(2)維持地方治安；(3)均平人民負擔；(4)改善人民生計；(5)普及大眾教育；(6)增進人民健康；(7)革新地方政治；(8)建立自治基礎。《綱要》前有一段說明如下：

本省為適應戰時需要，今後一切政治設施，不應因襲故常，必須立即採取積極鬥爭態度，為簡單明瞭迅速確實的措置，一方面力謀政治與軍事之配合，同時顧到抗戰與建國之並行以爭取抗戰的勝利，建國的成功，因此在軍事上務求增加抗戰力量鞏固地方治安，在經濟上力謀均平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計，在文化方面，則普及大眾教育以提高民族的警覺性，並增加健康，以加強民族的活動力，為求上舉各事項之實施，則革新地方行政與

---

<sup>172</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14。

<sup>173</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14-15。

建立自治基礎又為最小限度的要求。<sup>174</sup>

這個《施政綱要》就是江西戰時政治方針，而在這個綱要決定後不久，復奉到中央頒發《抗戰建國綱領》，自此江西戰時施政工作，即遵照《抗戰建國綱領》，並根據本省《施政綱要》而努力邁進。

1938年7月日軍侵入贛境，1939年3月南昌撤退，贛北各縣相繼淪為戰區，於是將敵佔區14縣劃為游擊區，其餘為鄰戰區或安全區，根據敵我情勢及實際需要，分別訂定施政方針。劃游擊區注重破壞，以破壞敵偽各種設施，打擊敵人，使其加速崩潰；對鄰戰區則注重協助，以服行戰時各種任務，協助軍事；對安全區則注重建設，積極推進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種建設，以適應抗建需要。<sup>175</sup>1940年度更依據當前抗戰形勢，針對敵人「以戰養戰」的企圖，決定以「戰時經濟建設」為本省施政中心，同時遵照中央「政治重於軍事」之指示，積極實施新縣制，以加強「政治攻勢」而協同軍事的發展。1941年度仍然續上年度方針，以發展「戰時的經濟建設」為施政中心，其目標為「以國防與民生兼籌並顧」，其方法則以「農業建設為中心而配合工業建設」。<sup>176</sup>

至於此時期比較重要之設施，茲分述其概要如下：

#### 1. 民眾組訓

江西民眾組訓工作，發動於剿共時期，組訓壯丁隊，協助清剿及築路建碕，頗著功績，匪亂收平後，復規訂層級訓練辦法，對於保甲義勇隊，施以充分訓練，抗戰軍興，民眾組訓，益感強化之必要，遂遵照中央法令訂定「本省戰時民眾組訓實施綱要」，將全省壯丁婦女少年分別予以組訓，設戰時民眾組訓委員會，負設計指導之責，而由民政廳督導壯丁組訓之實施，婦女指導處督導婦女組訓之實

<sup>174</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年），頁15。

<sup>175</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年），頁15。

<sup>176</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年），頁15-16。

施，教育廳督導少年組訓之實施，游擊區縣份，則於敵佔區內秘密建立核心組織以掌握敵後群眾。又為動員民眾發揮積極作用，訂定戰時任務隊組織辦法，通飭各縣以鄉鎮為單位，分別編組自衛游擊、偵探、運輸、救護、工程、通訊、宣傳、糾察、慰勞、掩埋、防空等 11 種任務隊，各民眾凡力能勝任某種任務者，責令至少參加一種，以符全民抗戰之旨。自 1941 年 8 月起，各級壯丁隊以遵令改稱為國民兵隊。<sup>177</sup>

## 2. 編組保安團

抗戰開始，江西即遵照軍政部頒布人民動員辦法，各省招編保安團以補充前方兼顧後方治安之規定，將各區縣保安警察隊重編為 10 個團，又徵集壯丁及收編志願抗敵民槍編為 12 個團，連原有 6 個團，共為 28 個保安團，以 14 個團擔任省防，以 14 個團擔任補充。其後迭經編整，至 1941 年共有 15 團。自日軍侵入贛北，江西保安團先後輪調遊擊戰區，參加作戰，獲得相當戰果。又為發動民眾集中力量以保護地方協助軍事起見，於 1938 年 1 月令各縣按照縣財力及防務需要，就地方民槍酌整編組人民自衛隊，後因防務及經費關係，迭有增減，截至 1941 年 10 月，各縣人民自衛隊共有 61 個大隊部，148 個中隊，38 個分隊，共有槍 16737 枝，為加強地方警察力量，樹立鄉村警察基礎，乃於 1942 年改編為各縣保安警察隊。<sup>178</sup>

## 3. 辦理兵役

1935 年兵役法公布後，江西為補充保安團隊，曾試辦初步徵兵。抗戰軍興，兵員需要激增，兵役工作漸繁，即遵令成立各級兵役機構，辦理徵集調撥。1938 年為一時權宜之計，曾創行「一甲一名備補兵」之暫行辦法，應付比額，又以曾受社訓者先徵，已受四個月之基本教育，素質亦較任何省分者為強，故軍政部認為江西徵兵有三優點：(1)不差欠數額(2)能如期撥送(3)素質頗優。中央統計江西

<sup>177</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16。

<sup>178</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21。



兵員補充成績居全國第三位，其實第一位之廣西，自 1932 年起即已開始徵兵；第二位之四川，則人口有七千餘萬之多，故不難於徵集。江西經歷年匪患，壯丁銳減，仍能佔第三位，自抗戰至 1942 年，前後共計出兵 60 餘萬人。<sup>179</sup>

#### 4. 糧食管理

江西糧食管理機構，始自剿匪時期南昌行營設立之江西糧食管理局，該局成立於 1933 年 7 月，除對匪區實施封鎖外，關於平準糧價，調節民食，均稍具端倪，惜成立一年即已撤消。抗戰期間軍糧民食，尤關重要，更應實施糧食管理，爰於 1940 年 7 月成立省糧食管理處(後改為糧政局)，各縣設縣糧食管理委員會(後改為糧政科)辦理糧食行政，及購銷儲運業務。又為掌握大量糧食以便調劑供求平衡糧價起見，實行徵購餘糧，以距秋收已遠，未著顯效，1941 年徵購乃改以田畝為對象，較有進步。又為平衡糧價計，經就人口密集之城市，舉辦糧食公賣，餘如搶購游擊區糧食，及接濟鄰省民食，均經切實辦理。<sup>180</sup>

#### 5. 難民救濟

抗日戰事爆發，江西即成立難民救濟分會，以收容戰區撤退之難民，隨時遣送後方配置，難民食米准予動用積穀。及至日軍侵入贛北，江西省府復於各縣交通要點分設難民招待站，招待過境難民，指示撤退路線，盡力搶救老弱婦孺出險，轉送安全地帶收容，難童則配置於保育院，計 1938 年份全省收容難民達 30 萬 6000 餘人，難童 1 萬 3000 人，經資遣省外者達 24 萬餘人。其後戰局穩定，難民人數漸減，1941 年度收容難民約 9 萬人。關於難民生產，先後設有省屬難民工廠 4 所，各縣難民工廠 11 所，在廠工作難民共有 3889 人，又零荒墾殖，以辦 16 縣，配置難民 4840 人。<sup>181</sup>

<sup>179</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17。

<sup>180</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18。

<sup>181</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18。

## 第四節 力倡教育

江西自古人文薈萃，兩宋之交朱熹講學白鹿洞書院，更使江西成為宋明理學之重鎮。惟近代海通以來，江西文化優勢地位逐漸下降，民國以後常年兵連禍結，加以紅軍長期盤據贛南，江西文化受到很大的摧殘，直接反應在教育的破敗及人才的凋零。<sup>182</sup>熊式輝雖出身武人，但本身文學素養深厚，加以曾留學東瀛，深知教育乃國家根本，故主政後力倡教育，期能孕育人才、振興江西。其具體事項茲分述如下：

### 一、推行國民教育

1940年6月，江西省教育廳訂定江西實施國民教育三年計劃，擬將全省23600保每隊設立保國民學校一所，除就原有保學19661所改辦外，並添設3939所，預定三年內完成。嗣奉行政院令，以「軍需孔急，國民教育暫緩辦理，如能籌得的款，可就經費情形，縮小範圍進行」，當以本省有保學為基礎，改辦國民學校較易著手，仍擬繼續提前實施。惟改辦校數減為1940年度1000校，1941年度2000校，所餘16661校，並予力謀充實，以為陸續改辦之準備。<sup>183</sup>

### 二、普設縣立中學

江西省政府教育廳鑒於各縣歷年保學及鄉鎮中心小學高級畢業學生數量增多，兼以各種地方建設幹部人才異常缺乏，實有積極訓練之必要，故為適應地方需要，促使政教合一起見，特督促各縣一律普設中學，以完成一縣一中學為目標。經就縣立中學特殊使命，訂定《江西省縣立中學實施計劃大綱》，通令施行。截至1941年10月底止，已設有縣立初級中學50校，完全中學3校，餘亦在籌設中。<sup>184</sup>

<sup>182</sup> 專研江西現代化的學者呂芳上即認為近代江西談不上現代化，甚至更呈現退化的現象。

<sup>183</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年），頁19。

<sup>184</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年），頁19。

### 三、增設職業學校

江西省為加緊實施生產教育，以與戰時生產建設相配合起見，特於 1939、1940 兩年度內增設省立造紙科實用初級職業學校於零都，製茶科初級實用職業學校於婺源，麻織科初級實用職業學校於宜黃，製糖科初級實用職業學校於贛縣。又為造就中小學勞作師資、改進生產教育起見，創辦勞作師資訓練所於遂川，並附設實習工廠，以製造教育及勞作工具。<sup>185</sup>

### 四、推動戰時教育

1937 年抗戰事起，熊式輝即發動各級教育機關擴大宣傳，據 1938 年統計，中等以上學校組織支宣傳隊共 506 隊，各縣教育機關組織支宣傳隊共 6803 隊，均能隨時隨地，努力工作。又因民訓幹部缺乏，江西省府特別動員保學教師兼任保壯丁隊政訓員，以推進民眾組訓。戰時學校遷移鄉村，多能利用機會，推進地方文化，江西省教育廳對於中等以上學校 1938 年度即訂有戰時教育實施綱要，特別注重軍事訓練，生產勞動訓練，戰時服務等項，督飭實施，並自 1938 年度起省立中等學校一率免收學費，以減輕學生負擔，對於戰區流亡學生更核給膳費，以資救濟。<sup>186</sup>

### 五、設立國立中正大學

江西省建設事業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缺乏建設所需之人才，尤其是高級人才。在高等人才培育方面，民國以來江西高等教育僅有省立工、醫兩專科學校，設立大學之議雖倡之有年，但迄未能實現。及至抗戰爆發，因戰事關係，國內大學多已西移，江西設立大學之需求更形迫切。熊式輝有鑒於此，並為實現蔣

---

<sup>185</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19。

<sup>186</sup>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頁 18-19。

中正教育理想，特籌劃創辦中正大學，以培植抗戰建國之基幹人才。中正大學於1939年9月開始籌備，1940年3月奉部電定為國立，仍由省府主持籌備事宜。同年9月間，國府任命胡先驌為國立中正大學校長，10月31日正式開學，此莊嚴偉大之最高學府，能於戰時創立於戰地江西，其意義殊為重大。<sup>187</sup>



---

<sup>187</sup> 馬博廠，〈國立中正大學之創設〉，頁1-12。另見《贛政十年》，頁19。



## 第五章 結論

江西自民國建立以來，即先後歷經了革命派人士掌政以及南北對峙時期，在此期間因戰事頻仍使省內的政治、經濟與民生建設少有進展，特別是代議制度有少部分的進展，但是贛人生活實未得太大之改善。直至國民政府北伐後熊式輝主贛，江西政局方逐漸穩定；但也因內部共產黨方面及外部日本方面的剿共以及抗日，對於江西政局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熊式輝主政江西後，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均有所作為，此部分可分為軍事與省政兩個大層面來檢討。一、在軍事方面，訓練縣保衛團並協同對共黨作戰，進行軍事剿共，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用以不同於以往以政治為主的方式去統治江西；二、在處理省政方面，推行「贛人治贛」及縣政改革，並以此策略協同剿共、解決中共蘇區，並掌握地方基層組織和農村。熊式輝的觀點與見地均有獨到之處，用於配合第三、第四次剿共，並可見微知著，防範未然。熊式輝在江西省政的經營上耗費心血、竭盡所能，並在剿共和清除共黨勢力上著墨頗深，最終讓國民政府成功奪回江西，對於江西基礎建設，以及人文素質的培養，都有極大貢獻。

而關於中國地方政治此一課題，以往學界多關注社會史研究，並聚焦於省以下的縣級政治，以民國地方政治的研究來看，省級政治問題一向不受重視。雖然國內也有省級政治的相關研究計畫，如以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的中國區域現代化研究，但卻因諸多原因，江西省並無納入此研究範圍，對於江西省省級政治的研究投入顯然有所不足。而有關中國現代政治史中的人物研究，過去大多研究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物，或是與領導人有密切關係者；至於領導者的部屬與下級官長，以往學界研究亦遠遠不足。近年來熊式輝回憶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的出版，可以說是一舉兩得，一方面解決對熊式輝人物研究資料的不足，二方面對於江西省政，乃至於縣政的發展，都多有一大部分的補充資料可以使用，且之前大部分的史料以及對於熊式輝的評

價，大多為共方論著及文史資料，並且強烈抨擊熊式輝之作為，藉由江西省主席之職位貪汙中飽私囊，雖無直接證據證明熊式輝貪汙事證，但是對於熊式輝個人聲譽以及評價，皆留下刻板印象，而有失公允。至於台灣學界有關熊式輝研究，又多半在於其政學系之背景，以及傳記式之論述，先少有對於其主政江西做一個完整範圍性的論述。

本文在前述諸般研究成果不足下，試圖以學術的角度，重新檢視熊式輝與國府對於省級治理的狀況(包含縣政、縣長)，以及其與蔣中正的人際關係。透過研究發現，熊式輝雖是蔣中正心腹親信，大多時候都會忠實執行蔣下達的各項政令，但在某些議題上，卻帶有私人的色彩，足見熊式輝並非蔣的旗子任由其擺佈。此外，熊式輝雖為軍人出身，但在治理江西的十年中，除了關於軍事的建設甚力之外，對於教育甚至交通建設也有相當的挹助與提倡，熊式輝的眼光未必如一般武人那樣短淺。

在國民政府主政大陸時期，軍人主政可以說是及具有普遍性，而正反兩派的想法都有，筆者認為雖然熊式輝為軍人，但是他主政江西的方法，以及治理江西的成果，已跳脫一般大眾對於軍人主政，硬梆梆鐵板一塊的想法，當然也是有論述說明，熊式輝在一次飛機意外中，腳已受傷，對於領兵統帥，已有相當的困難性，但是筆者認為，熊式輝在初期剿共時期，注重農村發展，交通建設；後期建設江西時期，注重教育，縣政發展，一步步的將自己的江西藍圖與以實現，並非一般的軍人，以屯兵戰爭為主，就這點熊式輝便與眾不同。

熊式輝主持江西軍政大局長達10年之久，可說是熊式輝事業生涯的最高峰，若要對其單就在贛政治裡的表現作一短評，筆者以為應是功大於過的。熊式輝致力將剿共時期時江西成功奪回並建設為抗日前線的碉堡，雖然在作戰中無法扮演主導的能力，但能夠有效地組織人民敵擋共黨的攻勢，給予後方其他省分很大的安定感。筆者以為此對其他省份的民眾而言，有一種精神鼓舞的作用。然而，江西在熊式輝的治理下雖能成為剿共及抗日的精神堡壘，但支撐這座碉堡的地基卻不紮實。熊式輝雖然強調軍政合一、縣政改革，但無法將之徹底落實，再加上，

年年的征戰，民眾對戰爭動員產生無力。越是臨近抗戰，軍民疏離的程度也就越大，此乃熊式輝無可推卸的責任。

簡單說明之，熊式輝對江西社會的連絡並不確實，對於想做的事情，大多未及完成，對於江西菁英缺乏往來，此種作法使熊式輝無法化解與贛籍人士的隔閡；加上用人多以自己親信或是有聲望的人士為主，更是省政治理上一大缺陷。簡言之，筆者認為江西這座剿共抗日的精神碉堡根基不夠穩固，雖然和一般軍人主政有所不同，但是仍然有其缺失。

熊式輝任上推行的政策，大多於其下臺後宣告廢止，人亡政息，實屬可惜。另如其特別重視的國立中正大學，也於抗戰勝利之後停止招生。但如果檢視其政策，就算拿到現今社會上來實行，也有部分能加以應用，所以筆者也認為熊式輝長於政策的規劃性，但領導用人則略有不足，總體說來還算是差強人意。

熊式輝主贛 10 載，在其極力治理下，雖能盡其全力去推行各項政策，但由於時空及環境因素的限制，其所得的成效亦有限。不過，江西省能從盲目亂徵稅目、加上大小紛爭不斷，以及匪患縱橫混亂等無政府狀態下，逐漸將省政導入正軌，熊式輝仍是居功厥偉。從此，贛省財政開始建立制度，省級以下地方治理亦有遵循的制度，教育事業也有進步，甚至能在艱難情況之下建立中正大學。江西省政一切開始有一定的條理可循，雖然熊式輝個人與其任命的官員中，有諸多可批評之處，但其主政 10 載所樹立的各項政績，亦應加以正視，給予其公允的歷史評價。

# 徵引書目

## 檔案

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革命文獻〉

〈特交檔案〉

〈特交文電〉

〈籌筆〉

《國民政府檔案》

《陳誠副總統文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經濟部檔案》

《資源委員會檔案》

## 日記、回憶錄、訪問記錄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臺北：國史館，2004 年）。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臺北：國史館，2006 年）。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臺北：國史館，2009 年）。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臺北：國史館，2007 年）。

國史館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北伐平亂》（臺北：國史館，2005 年）。

國史館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2004 年）。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紀錄，《蔣介石與我一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

楊森，《九十憶往》（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 年）。

賈廷詩、陳三井等訪問，《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

熊式輝，《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 年）。

劉峙，《我的回憶》收入近入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87 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年）。

稻葉正夫編、耿承光編譯，《岡村寧次大將回憶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72 年）。

白崇禧口述、賈廷詩等訪問兼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 年）。

## 工具書

武月星主編，《中國現代史地圖集：1919-1949》（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7 年）。

郭廷以，《中國民國史事日誌》第 1~4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1979-1985 年）。

## 專著、史料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冊---剿共》。（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 年）。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中文圖書供應社，1975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輯，《毛澤東軍事文集》（北

- 京：軍事文獻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
-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 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省情匯要》(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年)。
- 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 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台灣：商周出版社，1995)。
-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25 刊輯；《軍事委員長行營政治工作報告(民國 24 年)》(台北：文海出版，1935)。
- 金沖及，《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走向近代編輯小組，《走向近代：國史發展和區域動向》(台北：東華書局，2004)。
- 周美華，《中國從九一八到七七抗日政策的形成》(台北：國史館，2000 年)。
- 東亞同文會，《中國省別全誌》，第十一卷江西省(台北，南天書局出版，1988 年)。
- 林蔭番，《復興途上之縣政建設》(南京：誠信印書館，1934 年)。
-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年)。
- 國史館審編處編，《蔣中正總統文獻：革命文獻(三)剿共與西安事變》(台北：國史館出版，2002 年)。
- 國防部史政局編，《剿匪戰史》，(台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 年)。
- 梁敬錚，《史迪威事件》(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
- 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
- 程思遠，《白崇禧傳》(臺北：曉園出版社，1989 年)。
- 黃自進、潘光哲等編，《蔣中正總統五記》(臺北：國史館，2011 年)。

- 楊瓊熙著，《楊永泰先生言論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未標註）。
- 趙曾儔等編，《抗戰紀實》（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1 年）。
- 郭華倫，《中共史論》（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所印行，1982 年。）
- 蕭李居、周美華、王正華等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10-2011 年）。
-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
- 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臺北：巨流出版，2004 年第二版）。
- 吳相湘，《民國政治人物》（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 年，下冊）。
- 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
-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 年）。
-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著、王建朗等譯，《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胡博，《國民革命軍——師史總攬（一）陸軍第 1 師—第 20 師》（臺北：知兵堂，2008 年）。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東華出版，2001 年）。
- 張瑞德，《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1994 年）。
- 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 年）。
- 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 劉鳳翰，《黃埔建校與北伐》（臺北：黃慶中出版，2008 年）。
- 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臺北：聯經出版，2000 年）。
- 洪陸訓、段復初編，《軍隊與社會關係》（臺北：時英出版，2002 年）。
- 三軍大學主編，《國民革命戰史：第四部反共戡亂》上篇剿匪（第一卷~第五卷）（台

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1982 年)。

贛政十年編輯委員會，《贛政十年》熊主席治贛十週年紀念特刊 (江西：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一廠，1941 年)。

## 期刊、論文

呂芳上，〈民國初年的江西省議會，1912-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8，1989 年)。

呂芳上，〈江西現代化遲滯的原因試析〉，《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10，頁 1-10，1991 年)。

呂芳上，〈抗戰前江西的農業改良與農村改進事業，1933-1937〉，《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台北，1989 年)。

呂芳上，〈清末的江西省諮議局，1909-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1988 年)。

呂芳上，〈對訓政時期江西縣長的一些觀察，1926-1940〉，《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一冊，1991 年)。

張嘉驊，《建國與備戰—劉峙在河南的治理》(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9 年 6 月)。

楊捷屹，《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反共宣傳(1927-1939)——以《中央日報》為核心的探討》(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100 年 6 月)。

楊維真，〈朱培德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2 期，2006 年 3 月)。

賴煒曾，《從地方到中央：論徐永昌與民國(1927-1949)》(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100 年 6 月)。

何智霖，〈陳誠《家書》史料價值之分析——以江西剿共時期為例(1931-1934)〉，《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44 期，2008 年)。

林玲玲，〈陳誠與北伐——兼論北伐時期陳誠與蔣中正的關係〉《中華軍史學會》，



會刊》，(期 12，2007 年 9 月)。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林伯瀚，〈陳誠主政湖北之研究（1938-1944）〉（臺北：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 報刊

《江西文獻》

《中外雜誌》

《申報》

《大公報》

《中央日報》

《江西民國日報》

## 英、日文資料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56.

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hi, Hsi-sheng (齊錫生).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Edward L. Dreyer. China at War, 1901 – 1949.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 1995 .

Edward A. McCord.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

荒川章二，《軍隊と地域》(シリーズ日本近代からの問い 6)(東京：青木書店，2001 年)。

白井明雄，《日本陸軍「戦訓」の研究-大東亜戦争期「戦訓報」の分析》(東京：

芙蓉書房出版，2003 年)。

